

為基督受苦

理查得・魏恩波

版權：©1967，理查得・魏恩波
1967 年首次在英國出版
本版發行於 2005 年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英文聖經經文摘自新國王欽定本（版權
1979，1980，1982，Thomas Nelson Inc. 出版社-位於田納西州納
什維爾）

理查得・魏恩波先生的著作權已由他自己根據 1988 年版權、
設計和專利法進行聲明。

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複製、存儲在檢索系統中或以任何
形式或任何方式傳輸，未經出版商事先書面許可，也不得以任何形
式裝訂或封面進行傳播，除非與本出版物的發行和銷售條件相同。

英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物目錄記錄
這本書可從英國國家圖書館獲得
ISBN 978 0 340 86368 8

排版者：Avon Data Set Ltd.
位於 Goudy, Bidfordd on Avon, Warwickshire

印刷：CPI Group (UK) Ltd. 於 Croydon, CR0 4YY, 英國
本平裝書採用的紙張和紙板均為可再生的自然產品，源自可持
續發展的森林中種植的木材。製造過程符合原產國的環境法規。

Hodder & Stoughton
Hodder Headline Ltd 的分部，
位於倫敦西北 1 區歐斯頓路 338 號，郵編 NW13BH
www.madeaboutbooks.com 和 www.hodderbibles.co.uk

目錄

第一章 蘇聯人渴望基督	3
一個無神論者尋找基督.....	3
我對蘇聯人的事工.....	4
教會被誘騙.....	5
蘇聯人——一個靈魂饑渴的民族.....	7
在蘇聯軍營中傳福音.....	9
我們對被奴役國家的地下事工.....	14
地下教會如何半公開活動.....	15
臥底工作.....	17
第二章 “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	19
不可言喻的酷刑.....	19
抵制洗腦.....	22
短暫自由——而後再次被捕.....	23
我們的協議：我們傳，他們打.....	24
我妻子與兒子怎麼了？	26
“米海，信耶穌！”	27
第三章 被贖獲釋，到西方工作	29
我為什麼離開共產主義羅馬尼亞.....	30
第四章 以基督的愛，擊敗共產主義	32
我們如何喜樂——哪怕是在監獄裡.....	34
我們如何在靈裡進攻共產主義.....	36
遺忘了的歷史教訓.....	40

我獲得釋放後，找到了什麼？	43
為何我在西方也受苦.....	48
第五章 無敵而又廣泛傳播的地下教會	55
地下教會如何“吸收”無神刊物為己所用.....	60
為什麼連共產黨員也能得救.....	62
地下教會的組成部分.....	66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戰勝共產主義	69
冰山一角.....	69
對地下教會的迫害日益加劇.....	78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85
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86
我們極需聖經.....	87
基督徒殉道者家屬的悲慘遭遇.....	89
地下教會委託我帶給你們的信息.....	89

第一章 蘇聯人渴望基督

一個無神論者尋找基督

我從小就成了孤兒。我成長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裡，童年時期沒有接受任何宗教教育。由於經歷了苦難的童年，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艱難歲月裡感受到的貧困，14歲時的我已經和今天的共產黨人一樣堅定地成為了無神論者。我讀過無神論的書籍，不僅僅是我不相信神或基督——我甚至憎恨這些觀念，認為它們對人類心智有害。因此，我對宗教懷有深深的怨恨。

但後來我明白，我有幸成為了神所揀選的人之一，這個恩典是我無法理解的。這個原因與我的性格無關，因為我的性格非常糟糕。

儘管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總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吸引我走向教堂。我發現自己很難經過一座教堂而不進去。然而，我從未真正理解這些教堂裡發生的事情。我聽過講道，但它們並沒有打動我的內心。我對神的觀念是，祂是一個要我事事聽從的主人。我憎恨自己心中這種對神的錯誤觀念；但卻很嚮往宇宙中有一顆愛我的心存在。因為我的幼年和青年時期缺少快樂，因此我渴望有一顆愛我的心為我跳動。

我說服自己神並不存在，但又為不存在這樣愛的神而感到悲傷。有一次，我內心靈裡的掙紮促使我走進一所天主教堂。我看見人們跪下，喃喃禱告。我想，如果我也跪在他們身邊，學他們一樣念，也許會有一些事發生。他們正在向童貞女馬裡亞禱告：“充滿恩慈的馬裡亞”。我抬頭注視著馬裡亞，不斷重複地跟他們念著這些禱告詞，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感到十分沮喪。

有一天，當我還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時，我向神祈禱。我的禱告是這樣的：“神哪，我十分肯定你不存在。但如果你真的存在（我對此提出質疑），那麼不是我的責任要先相信你，而是你的責任要先向我顯示你自己。”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可是無神論不能給我平安。

在我這段內心衝突期間，一位住在羅馬尼亞高山地區的年邁木匠這樣祈禱：“神哪，我在世間服侍了您，我希望在世上得到和天上一樣的

回報。我要的回報是，在我未死之先，可以帶一個猶太人歸向你，因為耶穌是猶太人。可是目前我貧老多病，不能到處去找猶太人。我村裡也沒有猶太人。求你帶一個猶太人來這村子，我就盡力帶領他認識基督。”

我不能解釋為什麼我會到那個村莊。我在那裡並沒有任何事要辦。羅馬尼亞有一萬二千個鄉村，但我卻去了這一村。當那木匠發現我是猶太人時，就殷勤接待我，我必須說，沒有任何一個漂亮少女會從任何人得到那樣殷勤的款待！他曉得我便是神對他禱告的應允。他給我一本聖經。我以前出於文化的興趣，曾多次讀過聖經。可是這位木匠給我的聖經卻完全不同。後來他告訴我說，他和他太太為了我和我妻子的悔改，同心恒切禱告了許久。他給我的聖經不是用文字寫的，卻是在他的祈禱點燃的愛的火焰中寫的。我幾乎不能閱讀它，我只能哭泣。我看到我汗穢的生命與耶穌公義的生命；我的恨與祂的愛——祂接納了我成為祂自己的人。

不久以後，我的太太也悔改了。她也帶領其他靈魂歸向基督。那些人又帶領更多的人歸向基督，於是羅馬尼亞就又多了一個新興的信義會團契(Lutherans)。

不久納粹上臺，我們大大受苦。在羅馬尼亞，納粹黨採取了極端東正教分子的獨裁形式，迫害新教團體和猶太人。

在我還沒有正式成為牧師之前，我已經是這教會的領袖，因為我是它的創始人，我必須為它負責。我和太太多次被捕，遭打，見納粹法官。納粹黨的確可怕，但比較後來的共產黨，不過是小兒科。當時我必須給我的兒子米海一個非猶太名字，免得他被殺。

但這納粹時期卻有一種好處，就是給我們看到，外體的毆打是可以忍受的，人的靈若得到神的幫助，就能承受可怕的折磨。它又教導我們基督徒秘密工作的技巧，為即將到來的更艱難的日子做準備。

我對蘇聯人的事工

由於我懊悔自己曾是一個無神論者，於是從悔改那天開始，就渴望向蘇聯人傳福音。蘇聯人自小就受無神論薰陶。不久我這渴望就獲得滿

足，我不用去蘇聯就可以接觸到他們：這始於納粹時期，因為在羅馬尼亞有數千名蘇軍俘虜，我們就得到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動人事工。我決不能忘記第一次與一名蘇聯俘虜的談話。他是一個工程師。我問他是否相信神。如果他說不信，我不會感到希奇。每個人都可以信或不信。但他卻迷茫地望著我說：“我沒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叫我相信。如果上司這樣命令，我就信。”

我心都碎了，眼淚直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思想已經死亡的人，這人已經喪失神給人的最大恩賜——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在共產黨手中他已經被洗腦成了一個機器，隨時聽從信或不信的命令。他不再有自己的思想。這是一個地道的蘇聯人，是多年共產黨統治的結果！看到共產主義對人類的作為之後，我向神許願說，我要獻身於這些人，恢復他們的人格，讓他們對神和基督有信心。

從 1944 年 8 月 23 日開始，一百萬蘇聯軍隊入駐羅馬尼亞。不久共產黨就在我國掌權，開始我國的噩夢。相比之下，納粹時期的逼迫不過是輕微的。

那時羅馬尼亞的人口已經有二千四百萬，共產黨員的人數卻才一萬。可是蘇聯外交部長威辛斯基（Vishinsky）卻沖入我們敬愛的國王米加勒一世（King Michael I）的辦公室，拳擊桌面說：“你的政府必須任命共產黨員。”我們的軍隊和警察就被解散，共產黨憑著暴力上臺，為全國人民所憤慨。這事當時得到了美英兩國領袖的支持。

人們在神面前不僅要為個人的罪負責，也要為國家的罪負責。所有被奴役國家的悲劇都是美國和英國基督徒心中的責任。美國人必須知道，他們有時在不知不覺中協助蘇聯人在我們身上強加了一個謀殺和恐怖的政權。作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美國人必須通過幫助被奴役的人民歸向基督之光來贖罪。

教會被誘騙

共產黨得權後，就開始誤導教會。愛的言語和誘騙的言語相像。一個要娶一位少女作太太的，和一個只要她一夜的，都說：“我愛你”。耶穌吩咐我們辨別真愛與假愛的聲音，曉得真羊與披著羊皮的狼。遺憾

的是，當共產黨開始掌權時，數以千計的牧師、神甫、和傳道人都不曉得辨別這兩種聲音。

共產黨在我國的國會大樓舉辦基督教大會，有四千名各宗派的代表出席；包括神父，牧師與傳道。這四千代表推選史達林為大會名譽主席。這史達林也同時是世界無神機構的主席，和大面積屠殺基督徒的元兇。主教與牧師一個接一個在國會輪流發言，宣稱共產主義和基督教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可以共存。他們一個接一個稱頌共產主義，並保證教會效忠新政府。

我和我太太一同出席這場大會。太太對我說：“理查得，起來洗去基督臉上的羞辱！他們在祂臉上吐唾沫。”我對她說：“如果我這樣做，你就會失去你的丈夫。”她說：“我不需要懦夫做我的丈夫。”

我就起來稱頌，不是稱頌屠殺基督徒的兇手，卻稱頌神與基督。我說我們首先應對基督忠誠。當時這大會是現場直播，全國都從這共產黨大會主席臺上聽到了基督的信息！後來我必須為這次的發言付上代價，但卻值得。

東正教和新教的牧者們爭先向共產主義獻媚。一名東正教主教把鐮刀和鐵錘標誌縫在自己的聖袍上，又吩咐手下的眾神甫不要再叫他“主教閣下”，而要稱他為“主教同志。”神甫如巴特拉（Patrascioiu）和羅西亞（Rosianu）更直接，他們乾脆成為秘密警察的官員。羅馬尼亞信義會的副主教拉普（Rapp）開始在神學院教導說，神給世人三大啟示：第一個來自摩西；第二個來自耶穌；第三個來自史達林；而第三個比前面二個更大。

我參加一個在黎世達（Resita）的浸信會大會。這大會高舉紅旗，眾人起立高唱共產蘇聯的國歌。大會的主席稱讚史達林是一位偉大的聖經教師，並宣稱史達林成就了神的命令！

我們必須曉得，我所愛的真正的浸信會信徒完全不認同上述的領袖。他們依然忠於基督，也為基督大大受苦。但共產黨“推選”了他們的領袖，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今日共產國家的

“官方”（¹）教會。那些成為共產主義僕役（而不是神的僕人）的教會領袖，就開始攻擊不認同他們的弟兄們。

蘇聯基督徒在蘇聯革命後，開始創立地下教會。共產黨在羅馬尼亞攝取政權後，官方教會領袖出賣教會，於是我們被迫開始在羅馬尼亞也創立一個地下教會：這地下教會忠心傳揚福音，包括向孩童。共產黨全面反對地下教會；官方教會也附和共產黨的路線。

我與其他人一同開始地下工作。我有一個很體面的地位，正好作為掩護。這外表的地位便是：我是挪威信義會傳道會的牧師，又是普世教會聯會在羅馬尼亞的代表。（當時在羅馬尼亞的我們決沒有想到普世教會聯會竟會與共產黨合作。那時在我國，這團體單單從事救濟事工。）這兩個頭銜給我在當局面前有很好的信譽。當權者不曉得我的地下工作。

我的地下工作包含兩方面：首先是向蘇軍士兵的秘密事工。其次是向羅馬尼亞受奴役之百姓的地下服侍。

蘇聯人——一個靈魂饑渴的民族

對我說來，向蘇聯人傳福音是地上天堂。我曾向多國的人民傳福音，可是未曾見過像蘇聯人如此暢飲福音，他們是一個靈魂饑渴的民族。

有一位東正教神甫，是我的朋友，來電通知我說，一位蘇聯軍官找他，要求告解，認罪。我這朋友不懂俄語，於是就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因為知道我懂俄語。第二天這軍官就來了。他渴望神，可是未曾見過聖經。他沒有受過任何宗教教育，也未曾進過教堂（蘇聯教堂稀少）。他愛神，卻完全不認識祂。

我向他朗讀登山寶訓和耶穌的比喻。他聽了就在房間裡高興地跳舞說：“太奇妙，太美麗了！我不認識這位基督，如何能活著呢？”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因基督而歡樂。

¹：注：官方教會是指在政府註冊，由政府控制的教會。如今在集權國家的官方教會會員一般小於百分之十。其他信徒寧願在地下教會敬拜。

可是我隨即犯了一個錯誤。我向他朗讀基督被賣和受難，卻沒有給他心理準備。他沒有想到事情會這樣發展。當他聽到耶穌如何被打，被釘，並死亡時，就倒在椅子上哭泣。他曾相信一位救主，但如今這救主卻死了！

我看著他，自覺慚愧。我是基督徒，又是牧師和教師。但我從來沒有像這蘇聯軍官一樣體會基督的苦難。我看見他，就仿佛看見抹大拉的馬裡亞在十字架下痛哭，甚至在耶穌的屍體被埋葬後仍然哀哭不忍離去。

然後我繼續向他讀到耶穌的復活，並觀察到他的表情開始改變。他不知道他的救主已經復活。當他聽到這個奇妙的信息後，就拍打雙膝，發出一個汙穢不堪的（但我聽來卻是最聖潔的）咒語。這是他的粗俗說話方式。他又開始在房間跳舞，無比興奮地喊道：“祂活了！祂活了！”

我對他說，“我們禱告吧！”他不曾禱告，也不會我們“神聖的”禱告詞。他和我一同跪下，就說，“神哪，你真是個非常好的傢夥！如果換成我是你，而你是我的話，我決不會放過你的罪。但你確實是個非常好的傢夥！我全心愛你！”

我想天上的天使們也會停下工作，聽這個蘇聯軍官的崇高的祈禱。這人已經被基督得著了！

在一所商店，我看到一位蘇聯上尉和一位女軍官，正在購買各樣的東西。店員不懂俄語，難以瞭解他們。我就自願上前為他們翻譯，就熟悉起來。過後我請他們到我家吃中飯。餐前我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正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我們習慣在餐前禱告。”我就用俄文禱告。他們不再對食物感到興趣，放下刀叉，開始詢問有關於神、基督、並聖經的問題。他倆對這些一無所知。

和他們談話並不容易，因為他們已經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了。我告訴他們失羊的比喻；他們就問：“那人怎麼有一百隻羊？共產黨的集體農場還沒有充公那些羊嗎？”我說耶穌是王。他們就說，“所有的王都是挾制人民的暴君；耶穌肯定也是個獨裁者。”我告訴他們有關葡萄園租戶的比喻，他們就說：“這些租戶就是應該反叛葡萄園主。葡萄園該歸集體農場。”每一樣事物對他們來說都是新的。我告訴他們有關耶穌

的出生；他們就問（在西方人看為褻瀆的問題）：“馬裡亞是神的太太嗎？”我開始認識到，要向經過多年共產統治的蘇聯人傳福音，必須用全新的方法。

這道理也適合其他文化。到中非的傳道人難以翻譯以賽亞的話：“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以賽亞書 1 章 18 節）”中非沒有雪，當地的言語也沒有“雪”這字。於是傳道人就翻譯道：“你們的罪必白如椰子肉。”

於是我們必須把福音翻譯成馬克思主義者所能明白的言語。這不是我們靠自己能辦到的——但聖靈可以通過我們做成祂的工。

那個上尉和那位女軍官當天就悔改。過後他們極大地支持了我們向蘇聯人傳福音的地下工作。

我們秘密印刷了數以千計的福音書和其他基督教讀物，在蘇聯人中分發。透過悔改的蘇聯士兵，我們私運了許多聖經和單行本到蘇聯本土。我們還有一種傳福音的方法，把神的話送到蘇聯士兵手中。蘇聯士兵已經打仗多年，許多人久別兒女，心深思念（蘇聯人十分喜歡小孩。）我的孩子米海，和其他不到十歲的孩子們，口袋裡裝滿了聖經、福音書等讀物，就跑到在街頭或公園的蘇聯士兵當中。士兵大哥就會拍著他們的頭，友愛地和他們說話，同時想及自己久別的兒女。士兵們又給孩子們巧克力或糖果。孩子們就拿出口袋中的聖經和福音書，作為回報。士兵們都很樂意接受。這對我們是及其危險的行動，對孩子卻完全沒有問題。他們是向蘇聯人傳福音的小宣道士。效果非常好。許多士兵因此得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得到的福音書。

在蘇聯軍營中傳福音

我們不單向蘇聯士兵進行個人佈道。我們有時也做小組工作。

蘇聯人很喜歡手錶，見表即搶。在路上他們會截住行人，索取手錶。我們常看到蘇聯士兵的雙臂都戴著好幾隻手錶。一些蘇聯女軍官竟把鬧鐘當項鍊掛在頸項上。他們從未戴過手錶，所以絕不會嫌太多。羅馬尼亞人如果要擁有手錶，就必須到蘇聯軍營裡去購買，很多時候他們

就買到自己被搶走的手錶。於是羅馬尼亞人進入蘇聯軍營成了常事。地下教會要找蘇聯人就有一個很好的藉口：買手錶。

我第一次進入蘇聯軍營傳福音是在一個東正教的節日，聖保羅和聖彼得日。我進入軍營佯裝買手錶。我嫌一隻太貴、一隻太小、另一隻又太大。幾個士兵就圍著我，每個人都有手錶要賣。我笑著問他們說：

“你們當中有誰名叫保羅或彼得？”果然有。我就說：“你們曉不曉得，今天正是你們東正教慶祝聖保羅和聖彼得的日子？”（一些年長的蘇聯人曉得。）於是我就說：“你們知道保羅和彼得是誰嗎？”沒有人曉得。我就開始告訴他們有關保羅和彼得。一個年長的士兵插嘴說：

“你不是來買手錶的！你來是為了告訴我們有關信仰。坐下來告訴我們！但要非常小心！我們知道誰必須提防。目前在這裡的都是好人。但當我把手放在你的膝蓋上，你就必須專談手錶。等我把手拿開，你才繼續傳你的信仰。”

相當多人就圍著我。我就談及保羅和彼得，並他們為之獻身的主耶穌。好幾次有些可疑的人加入圈子裡，那老兵就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我就只談手錶。直到那人離開了，我就又繼續談福音。在蘇聯基督徒士兵的幫助下，像這樣的集會進行了許多次，許多同志得著基督，數千本福音書得以秘密地分發出去。

我們地下教會的好些弟兄姐妹為此被捕，被打得死去活來，但他們都沒有出賣我們的組織。

在這工作中，我們驚喜地遇到蘇聯地下教會的成員，得以聽到他們的經驗。我們看到他們是如何成聖的。他們經歷了多年的共產主義洗腦，有些甚至進過共產黨的大學（中央黨校）。但就如生活在鹽水中的魚，其肉依然鮮甜，不帶鹹味；又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他們的靈魂也依然清淨潔白。

這些蘇聯基督徒有那麼美麗的靈魂！他們傷感地說，“我們曉得自己帽子上戴的錘鐮星，正是敵基督的星。”他們極大地幫助了我們向其他的蘇聯士兵傳福音。

我可以說他們擁有基督徒的一切美德，只少了喜樂。他們只在悔改的日子喜樂；不久就不再歡喜。我為此思考良久。於是有一次，我就問一位浸信會信徒：“為什麼你沒有喜樂？”他回答說，“我怎能快樂？

我不能讓自己的牧師知道我是真信徒，又不能讓他知道我時常禱告，還向人傳福音。因為那牧師正是秘密警察的內線。我們一個接一個地被監視、被出賣，而監視、出賣我們群羊的正是羊群的牧者。我們的內心深處有救恩的喜樂，可是你們能表露的外在喜樂，我們卻不能表露出來。”

基督教對我們就如遊樂場的過山車。你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得著一個靈魂後，就得著一個會員進入安全的教會。可是當我們這些生活在被奴役國家的信徒得著一人，就知道他可能下牢，他的孩子們可能成為孤兒。帶領一個人歸主的喜樂，總是摻著這種必須付出某些代價的感覺。我們遇到的是一種全新的基督徒；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在這裡，我們有很多的驚喜。

就如許多人誤以為自己是基督徒，其實卻不是；蘇聯也有許多人肯定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卻不是。

我曾在火車上遇到一位蘇聯軍官。我才向他說了幾分鐘有關於基督的事，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發表無神的論證。他引述馬克思，史達林，伏爾泰，達爾文，並其他人的話反對聖經。他不給我任何反駁的機會。他講了將近一個小時，為了要說服我沒有神。當他說完後，我問他說：“如果沒有神，怎麼當你遭難時，卻會禱告？”就如一個正在行竊的小偷忽然被人逮住，他驚訝地問道：“你怎知我禱告？”我不讓他逃脫。“是我先問你的，為什麼禱告？請回答！”他低頭承認說：“在前線，當我們被德軍圍困時，我們都禱告！我們不曉得如何禱告，就呼叫，‘神與母親的靈！’”（在察看人心的神眼中這一定是非常好的禱告。）

我遇到一對蘇聯夫婦，都是雕刻師。當我告訴他們有關於神時，他們的回答是：“不，神不存在。我們是布爾什維克——無神論者。但我們可以告訴你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趣事。

“有一次我們雕刻史達林的石像。正工作中，我太太忽然問我，‘你如何看我們的拇指？如果我們的拇指與腳趾一樣（五個腳趾指向同一個方向），而不是指向與其他四個手指不同的方向，我們就拿不住錘子、木槌、工具、書本、或是一片麵包。少了這小小的一隻拇指，人類就幾乎無法生活。那麼，是誰造了拇指？我們倆在學校讀馬克思主義，

曉得天地自然存在，不是神造的。我也這樣相信。但如果神沒有創造天地，而僅僅造了這一隻拇指，為了這件小事，祂已經值得稱頌了。

“‘我們稱頌愛迪生、貝爾、史蒂芬生，因為他們發明瞭電燈泡、電話、火車等物。為什麼我們不也稱頌那個造拇指的？愛迪生如果沒有拇指，能發明什麼？我們實在也應當敬拜那個造拇指的神。’”

那位丈夫當然生氣，就如任何一位丈夫，在太太發表高見時，肯定會生氣一樣。“別說蠢話！你曉得沒有神。你不知道房子裡是否裝有竊聽器。我們會惹上麻煩的。現在你就必須下定決心，說沒有神。在天上只有‘無人’！”

那太太回答說：“這更是奇怪了。如果天上有一個全能的神，就如我們愚昧的祖先所相信的那樣，那麼我們有拇指並不稀奇。因為全能的神可以造任何東西，當然可以造拇指。但天上若只有‘無人’，那麼我就全心敬拜那個能造拇指的‘無人’！”

於是他們倆就成了‘無人’的信徒！他們對這‘無人’的信心，與日俱增。他們漸漸相信，這‘無人’不單造了拇指，也造了星星、花朵、孩童、並生命中一切美麗的事物。他們就如當初使徒保羅遇到的雅典人，敬拜未知之神（使徒行傳 17 章 23 節）。

這對夫婦聽到我說及在天上真的有一個‘無人’——神，也是聖靈——時，他們快樂得無以形容。這‘無人’神是個靈，充滿慈愛、智慧、真理、和權力，又如此愛他們，甚至差遣祂的愛子到世上，為他們捨命在十架。

他們聽見福音之前，已經是信徒。我只是帶他們再進一步，叫他們經驗救恩與救贖。

又有一次，我看見一位蘇聯女軍官走在街上。我上前向她說：“對不起，我曉得不應該貿然向一位素不相識的女性說話。可我是一個牧師，我的動機是真誠的。我希望和你談談基督。”

她問我說，“你愛基督嗎？”我回答道：“是的！我全心愛基督！”她就投在我的懷裡，不斷地吻我。對一個牧師，這是非常尷尬的場面。於是我就給她回吻，希望路人以為我們是親屬。她對我說，“我也愛基督！”我帶她到我家後，驚訝地發現，她完全不曉得任何有關於基督的事——絕對的一無所知——她只知道這名字，但她卻愛祂。她不

知道基督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是什麼。她不曉得基督曾經活在這裡，也不曉得祂怎樣死亡。她不知道祂的教訓、祂的生活、祂的事工。對我來說，她是個心理學上的奇特現象：如果你只知道一個人的名字，你怎麼能愛上他呢？

她向我解釋道，“當我小時，人們教我看圖識字。A 代表蘋果 (Apple)；B 代表鈴 (Bell)；C 代表貓 (Cat) 等。

“當我進入高中，他們教導我說，我的神聖任務就是為共產主義祖國奮鬥；又要維護共產主義的道德。但我不曉得什麼叫‘神聖任務’，什麼是‘道德’。我必須看一個圖畫。我曉得我的老家有一幅人像，代表至善至美的事物。我祖母總是向這圖像敬拜。她說這人是基督。我就愛上這個名字。這名字對我來說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只要說這名，我就心中歡喜。”

聽見她的話，我就想起腓利比書 2 章 10 節說，萬膝要因耶穌的名而跪拜。也許那將到世上來的敵基督可以暫時塗滅神的知識。但基督的名本身就有能力，可以光照人。

她在我家裡歡樂地找到基督。如今她所愛的真基督活在她的心裡了。

我遇到的每一個蘇聯人都如一首詩歌。一位姐妹在火車站傳福音，她把我家的地址給了一位有心尋道的軍官。一個黃昏，這軍官來了。他是一位高大英俊的蘇軍中尉。

我問道：“我可以幫你什麼？”

他回答道：“我來尋求亮光。”

我就開始向他閱讀聖經裡最重要的部分。他把手放在我身上，說，“我從心底裡懇求你，不要誤導我。我屬於一種被囚在黑暗中的百姓。求你告訴我，這真的是神的話嗎？”我向他保證肯定是。他聽了幾個小時後，就接受了基督。

蘇聯人對宗教決不馬虎。不論他們是支援宗教，或是反對宗教，總是全心投入。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蘇聯，每個基督徒都是贏取靈魂的宣教士。歷史上的蘇聯人也是有宗教的人民。他們是成熟的莊稼，可以結滿福音的果實。如果我們努力把福音帶給他們，世界的局勢

將會改變。可惜世界的宣教事工幾乎完全遺忘了極其渴慕神話語的蘇聯人民，這真是個悲劇。

我們向蘇聯人的傳道大有果效。

我記得畢歐德（Piotr）。沒有人知道他消失在蘇聯的哪一個監獄。他還那麼年輕，大概只有二十歲。他隨同蘇軍來到羅馬尼亞。他參加我們的地下聚會，悔改、受洗。洗禮後我問他哪一節經文給他最深的印象，以至他悔改。他說，在我們的一次秘密聚會中，他聽我讀到路加福音 24 章，耶穌在以馬忤斯路上遇見兩個門徒。當他們靠近那村時，耶穌似乎要繼續走（28 節）。畢歐德就說：“我希奇耶穌為何這樣。祂肯定要和門徒同在。為什麼祂似乎要繼續走？”我解釋說祂是出於禮貌。祂希望這兩人真的要祂留下。當祂看到他們果然要求祂留下，就欣然一同住下。共產黨則完全不同。他們粗暴地進入我們的心中與腦海裡。他們強逼我們從早到晚都聽他們。他們借著學校、電臺、報紙、海報、電影、無神論會議，每一處，向你強制灌輸他們的無神論，不論你喜不喜歡。耶穌卻尊重我們的自由。他只輕輕地敲我們的心門。

“耶穌的禮貌贏得我的心，”畢歐德說。共產主義與基督的強烈反差使他信服基督。他不是唯一因著耶穌這性情而悔改的蘇聯人。（我雖是牧師，卻從未想到這一點。）

畢歐德悔改後，多次冒險把基督教讀物從羅馬尼亞私運到蘇聯的地下教會，最後他被捕。我最後一次聽到他消息時他還在坐牢。他是否已經死了，如今正在天上？或者他還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今天在哪裡。

像畢歐德一樣並非僅僅得救的還有許多。我們不可以僅僅停留在拯救靈魂這一步，這只做了一半。每一個被基督拯救的靈魂必須成為得人的漁夫。這些蘇聯人不單成為基督徒，也成為地下教會的宣教士。他們為基督義無反顧。他們總是說，能為替他們死的基督作的實在是太少了。

我們對被奴役國家的地下事工

我們第二項工作，就是向羅馬尼亞人民的地下宣教服務。

起初，共產黨人用誘騙的手段來爭取教會領袖站在他們一邊，但很快他們便撕下了面具。隨後恐怖開始，數以千計的人下牢。現在，為基督贏得一顆靈魂對我們來說也變成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就像蘇聯人長期以來所經歷的那樣。

例如，後來我在監牢裡與一些門徒同囚。這些信徒是我傳福音給他們而信的。有一次我與一位弟兄同囚。他因為信基督而坐監，留下妻子與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很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問他說：“你會不會恨我？因我領你信基督而使你和全家落到如此悲慘的光景？”他回答道：“我不能述說我對你的感謝。你使我認識這一位奇妙的救主。其他什麼東西我都不要了。”

在這個新環境下傳福音並不容易。我們的人民受盡了壓迫。共產黨向每一個人剝奪他們的財產。他們奪走農民的土地和羊群；他們奪取理髮師或裁縫的小店鋪。他們不單充公資本家的財產，也傷害非常窮苦的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入獄。我們極度貧窮。人們開始問：“慈愛的神為何讓邪惡得勢？”

正如最初的使徒們也很難在第一個受難日傳道。當時耶穌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但這福音事工持續結果累累，證明做工的是神，不是我們。基督徒的信心就是這些問題的答案。例如，耶穌告訴我們有關於窮乞丐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被欺負，就像我們一樣——害病垂危、饑腸轆轆、傷口被狗舔——但結果卻有天使來，把他帶到亞伯拉罕的懷中。

地下教會如何半公開活動

地下教會在家裡、樹林、地下室，並任何她能聚會的地方秘密聚會。與其他被奴役的國家一樣，羅馬尼亞地下教會只有一部分在地下。就像冰山，會有一個小角露出水面；地下教會也有一小部分的操作是公開的。比如，在共產黨眼皮底下，我們制定街頭佈道的計畫，這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可那也是唯一能夠救到一些靈魂的地方。我的太太在這方面非常活躍。首先是幾個基督徒靜靜地在街頭聚集，然後開始唱歌。

人們圍攏過來聽這美麗的歌聲。我的太太就開始佈道。我們在秘密警察聞風趕來以前，就已經散會了。

一天下午，我在其他地方忙碌時，我太太在首都的馬拉西 MALAXA 工廠前，向幾千工人傳講神的救恩。第二天，該廠的許多工人因為反抗共產黨的不公而被槍殺。他們及時聽到了福音！

我們是地下教會，可是有時我們也像施洗約翰一樣公開傳道，向人民，也向統治者。有一次，兩位基督徒弟兄沖上政府大廈前的臺階，在僅有的一點時間裡向首相喬治烏·德治（Gheorghiu Dej）見證基督。他們促請首相停止逼迫，馬上悔改歸向神。首相因他們竟敢如此大膽見證神而把他們投入監牢。多年後，當這首相病重時，那兩位弟兄付出重價播撒的福音種子就開始在他心中發芽生長。在那困難時刻，這首相就想起他們的話。正如聖經所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希伯來書 4 章 12 節）。”它們切開他的鐵石心腸，他終於降服下來，認罪悔改，接受了救主，並開始在病中服侍主。不久他就去世了。但因著當日那兩位弟兄願意付出代價，他得以歸到他新找到的救主那裡。這兩位弟兄是當今奴役國家勇敢之基督徒的寫照。

在共產黨的壓迫下，傳福音變得越來越難。不過我們還是成功地通過了共產黨的嚴格審查，印發了好幾種基督教讀物。比如，我們交給審查人員的一些小冊子的首頁，是共產主義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頭像，書名則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審查人員以為這是共產黨的書，就蓋章通過。其實這些書只有頭幾頁引述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只為瞞過審查人員——其餘的都是有關基督的福音。

然後我們就到共產黨的大慶典中，分發這些“共產”書刊。共產黨員看到馬克思的相片，都競相搶購。當他們讀到第十頁，發現內容都是有關神和基督時，我們已經離開好遠了。

就這樣，地下教會不僅在地下秘密聚會，也勇敢地在共產黨的街道向共產黨的官員傳福音。這是要付代價的，我們也準備好了。如今的地下教會依然樂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臥底工作

秘密警察極力逼迫地下教會，因為他們認識到教會是共產黨面對的最後一道有力抵抗。這靈裡的抵抗比任何反抗還強。如果任由教會發展，他們的無神政權就要被侵蝕。共產黨就如魔鬼，知道教會對他們的直接威脅。他們曉得一個人如果相信了基督，就不會成為一個沒有獨立思想的、任人操縱的工具。他們曉得他們只能囚禁人的身體，卻不能囚禁人的靈魂——他對神的信心。所以他們極力與教會戰鬥。

但也有同情支持地下教會的人，有些甚至打入到共產黨政府機關和秘密警察裡面。

我們吩咐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穿上眾人最憎恨的制服，以便把秘密警察的行動透露給地下教會。一些地下教會的弟兄就這麼做了。他們隱藏自己的信仰。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穿著共產黨的制服，卻不能透露他們真正的任務，因此遭到親人朋友們的鄙視。但他們因為愛基督，就選擇這樣做了。

當我在街上被綁架，多年被關在最機密的監房裡時，一名基督徒醫生就成為秘密警察的成員，只為找出我的下落！他作為秘密警察的醫生，就能進出所有的監房，希望能找到我。他的朋友們都回避他，以為他成了共產黨員。對他來說，穿著刑吏的制服四處走動，比穿著囚犯的衣服要付出更大的犧牲。

這位醫生終於在一所黑暗的地下獄室找到了我，就向外界透露我還活著。他是我下獄八年半後，首先發現我下落的朋友！正因為他透露的這消息，所以1956年在艾森豪總統(Eisenhower)和赫魯雪夫

(Khrushchev)“解凍”時期，眾教會就強烈呼求釋放我，我因此獲得短暫的自由。如果沒有這位基督徒醫生為了尋找我而特意加入秘密警察，我就不可能被釋放。我可能如今不是仍然在獄中就是在墳墓中了。

這些地下教會成員又利用他們秘密警察的地位，多次給我們通風報信，大大地幫助了我們。在共產黨國家的秘密警察中，現今仍有地下教會的兄弟姐妹們。他們暗暗保護並警告基督徒即將到來的危險，其中一些人甚至打入了政府的上層組織。他們暗中持守對基督的信仰，秘密地

幫助我們。雖然現在他們只能暗中侍奉祂，總有一天，到天家，他們就可以公開承認基督了。

然而，地下教會依然有多人被發現、遭囚禁。我們當中也有好些“猶大”們，向警方告密。共產黨借著毆打、毒品、威脅、勒索，嘗試找到願意出賣弟兄們的傳道人和平信徒。

第二章 “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

我從事官方和地下的雙重工作，直到 1948 年 2 月 29 日。在那個晴朗的星期日，我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就被秘密警察綁架了。

過去我不曉得聖經說的“偷人”是什麼意思。共產黨讓我明白了。

有好些人就這樣被綁架。當時有一輛秘密警察的箱型車忽然停在我面前，四個人跳下來，推我上車。我被關入監獄，在那裡被秘密關押了八年多。在那段時間裡，無人知道我是死是活。有一位秘密警察冒充出獄的囚犯，告訴我太太說，他在獄中參與了我的葬禮，害我太太傷心欲絕。

那時，各宗派被捕下獄的信徒數以千計。共產黨不單逮捕牧者，也抓平信徒；凡為基督作見證的農民、男孩、女孩都被抓。那時的羅馬尼亞也像其他共產國家，監獄爆滿。還有，入獄就意味著酷刑。

有些酷刑太可怕。我寧可不提。如果我提起，晚上就不能成眠，因為實在太痛苦了。

在《神的地下教會》一書中，我有詳細說及在獄中所經歷到的神。

不可言喻的酷刑

一位名叫弗羅李斯古（Florescu）的牧師，被熱鐵和刀酷刑，又被打個半死。然後他們把成群的餓鼠從一根大管子灌入他的獄室。他必須時刻防衛自己，不能睡覺。每當他歇息，老鼠就會攻擊他。

他們逼他日以繼夜地站立了兩個星期，要他出賣弟兄們。可是他不要讓步。最後他們把他的十四歲兒子帶來，當著父親的面鞭打他。他們說要打到這牧師降服。這父親幾乎崩毀。實在無法再忍受了，他向兒子哀叫：“亞歷山大，我必須說出他們要的！我不能忍受你再受鞭打了！”那兒子回答說：“爸爸，不要這樣。我不希望看到一位出賣神的父親。堅持下去！如果他們殺了我，我最後的話就是‘耶穌和我的祖國！’”施刑的共產黨員們大怒，撲到這孩子身上，一陣毒打，以至於監獄的牆壁上都濺滿了他的鮮血。這孩子就這樣被活活地打死。男孩臨死時還讚

美神。目睹這一切後，我們親愛的弗羅李斯古弟兄再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

我們的手腕上戴著特製的手銬，裡邊有尖釘。如果我們完全不動，這些釘子不會傷身。可是獄中的寒冷叫我們顫抖，釘子就把我們的手腕刮破。

基督徒被倒吊在繩子上毒打，以致他們的身體在擊打下來回搖擺。又有些被放在特製的四壁都結冰的‘冰箱獄室’中。我曾被拋入這樣的獄室，身上只有一點衣物。獄室的醫生透過一個開口觀察，當他們看到囚犯快要凍死了，就發出警告，守衛就沖進來把我們帶出去融化。當我們開始暖化時，馬上又被送回冰室，這樣不斷重複——快凍死前的一兩分鐘被救回；然後再凍；再救——就這樣沒有止境地折磨我們！直到如今，有時我還不敢打開冰箱。

我們基督徒有時被關在剛夠容身的木箱，沒有轉身的餘地。然後他們就從四面把尖銳的釘子打入。我們站立不動就沒事，但我們被逼站立無數個小時。當我們疲憊不堪，因疲勞而身體晃動時，釘子就刺入我們的身體。如果我們移動或抽動一塊肌肉——就會被那些可怕的釘子刺破。

共產黨對基督徒的迫害，遠超過人類所能瞭解。我見過共產黨員折磨基督徒時，臉上露出狂喜，嘴裡還大喊：“我們就是魔鬼！”

我們不是與屬血肉的摔跤，卻是與那空中邪惡的權勢爭戰。我們看到共產主義不是來自人，卻是來自魔鬼。這是一股靈的力量——邪惡的力量。要勝過它，必須憑著另一種更大的屬靈力量，就是神的靈。

我時常問施刑者：“你們難道沒有憐憫之心嗎？”他們就引用列寧的話：“你煎蛋怎能不打破蛋殼？”或是，“你鋸木怎能不使木屑亂飛？”我就說：“我也讀過列寧的這些話。可是人不是木頭。你鋸木，木頭不會感到痛。可是你打人，每一拳都痛；又有母親們哀哭。”可是沒用。他們是物質主義者。他們看人就如木頭，如蛋殼。這種信仰導致他們極端的殘忍。

無神論者的殘暴令人髮指。當一個人不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就沒有理由被稱為人類，他變得無限邪惡。共產黨施刑者常說：“沒有神、沒有來生、沒有賞罰。我們完全可以任意而行。”我聽過一個施刑

者甚至說：“我感謝那個我不信的神。他讓我活到如今，叫我可以盡情發洩心中的邪惡。”他對待囚犯手段殘忍，簡直叫人難以置信。

看到鱷魚吃人，我會傷感，但我不能責備那鱷魚，因為鱷魚沒有道德觀念。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責備共產黨員。共產主義已經消滅了他們裡面的一切道德觀念。他們誇口說自己沒有憐憫之心。

我從他們學到一項功課，就是：一如他們堅決不容耶穌在他們心中；我也堅決不容撒旦存在我心中。

我曾向美國參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做見證：基督徒被綁在十字架上，長達四天四夜。這些十字架先被平放在地上，其他數百名囚犯必須在這些被綁者的臉上和身上大小便。然後這些十字架就重新被舉起。共產黨員就譏笑說：“看你們的基督！多好看！祂還帶來天上的芬芳！”我又提及一位神父被酷刑到幾近發瘋，還被逼把人糞當聖餅，人尿當聖酒，分給眾基督徒。這事發生在羅馬尼亞的比特司提監牢（Pitesti）。我在事後問這位神父，為什麼要參與共產黨的這場嘲諷，而不寧可死亡。他回答說，“請不要論斷我。我受的苦比基督還多！”聖經形容的地獄和但丁形容的煉獄，其中的痛苦都遠不如共產監獄中的酷刑。

這些只是比特司提監獄的一個星期天裡的一個小插曲。還有許多無法述說。如果說多了，我也受不了。它們實在太可怕、太淫穢了，令人無法下筆。這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們過去所遭受、並現在仍然在經歷的！

如果我繼續述說共產黨的一切暴行，和一切基督徒的自我犧牲，我就永遠說不完。但我覺得不單要使人知道這些酷刑，更應該使人知道監獄中信徒們英勇舍己的行為。以下這些在監獄中的英勇事蹟曾經極大地鼓舞了暫時還是自由的弟兄姐妹們。

其中一個信心偉人是米蘭·海莫維奇牧師（Milan Haimovici）。

在獄中，不時會有犯了監規的犯人被叫出來鞭打。由於監獄爆滿，守衛們記不得我們的名字，人與名對不上號。所以每當叫名時，不管是叫誰，米蘭牧師就應聲出來，代替別人挨打二十五鞭。他不單因此贏得了眾囚犯的敬重，他所代表的基督也贏得了眾人的尊重。

我們地下教會有一名同工是一位少女。共產黨的警察發現她秘密傳福音，又教導孩童有關基督的故事，就決定逮捕她。為了加劇她的痛

苦，他們拖延了幾個星期，直到她婚禮的那一天才逮捕她。婚禮那天，少女披上婚紗——這本是女孩子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突然，門被撞開，秘密警察們沖了進來。

這新娘看到秘密警察，就伸手讓他們銬上。他們粗暴地把她銬了。她看著她的愛人，吻著手上的鐵鍊說，“我感謝天上的新郎在我結婚之日送給我這珠寶手飾。祂看我配為祂受苦。”他們就把她拖走了，留下一群基督徒和新郎相對而泣。他們知道基督徒少女在共產黨手中的遭遇。她的新郎一直忠心地等著她。五年後這少女出監——成了憔悴不堪的婦人，似乎老了三十歲。她說，為了基督，這只是她可以做的最小的事。地下教會竟有如此美麗的基督徒。

抵制洗腦

西方人聽過朝鮮戰爭並越南戰爭的洗腦。我也經歷過洗腦。這是最恐怖的折磨。

我們每天必須坐十七個小時，有時數周，有時幾個月，甚至長達數年，聽這廣播：

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共產主義好！

基督教愚笨！基督教愚笨！基督教愚笨！

放棄吧！放棄吧！放棄吧！

一些基督徒問我如何才能抵抗洗腦。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洗心。”如果我們的心愛耶穌，被耶穌基督的愛清洗，就能抵抗一切酷刑。一個心中充滿愛的新娘有什麼不肯為她新郎做的？一位有愛心的母親有什麼不願給她的孩子？如果你愛基督就像馬裡亞懷抱嬰兒耶穌，就像新娘愛她的新郎，那麼你就能抵抗這種酷刑。

神並不在乎我們忍受多少，卻在乎我們愛多少。我可以見證為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真的是愛神又愛人。我就是見證人。

獄中的酷刑和虐待從來未曾中斷。當我喪失知覺，或被打得神志不清以至不能提供任何口供時，他們就送我回去牢房。我躺在那裡，無人理會，半死不活，直到力氣稍微恢復，他們就繼續拷問。許多人就死在這種光景中。但我的力氣居然總是能夠恢復。在隨後的幾年裡，我經過

了好幾所監獄。他們打斷我四節脊背骨，並好些其他的骨頭。他們又在我身上燒烙和刺開了十八個洞，刮去十多塊肉。

當我和家人被贖離開羅馬尼亞來到挪威時，在奧斯陸（Oslo）的挪威的醫生看到我身上的傷疤，並肺部的結核疤痕，就說我如今依然存活真是個奇跡。按照他們的醫學書，我應該已經死了好多年了。我也知道這是個奇跡。我們的神是一個行神跡的神。

我相信神行這項神跡，是叫你們可以聽到我代表共產黨國家的地下教會所發的呼聲。祂讓我一人活著出來，為要叫我大聲傳達那些為主忠心受苦的弟兄們的信息。

短暫自由——而後再次被捕

到了1956年，我已經坐牢八年半；體重大減，疤痕累增。我遭受拳打腳踢、饑餓壓迫、拷問威脅、缺乏照顧。可這些還是不能使我供出囚禁我的人想要的。最後他們在失望中，也因為有許多人為我的被囚抗議，就釋放了我。

我重新作牧師；但只維持一個星期。那時我才傳了兩篇道，他們就把我叫去，命令我不得再傳，也不能再從事任何宗教活動。我說了什麼呢？我曾勸告會友們“忍耐，忍耐，再忍耐。”“你叫他們忍耐什麼？不是忍耐等候美國人來救他們嗎？”警察對我咆哮著。我又說時代的巨輪不停地轉動。“你正在告訴他們，共產黨不能長久統治！這是反革命謊言！”他們尖叫道。如此我的公開侍奉到此為止。

當局相信我會害怕他們而不敢再秘密傳道了。他們估計錯了。在我家庭的支持下，我暗中又開始過去的事工。

我又向隱秘的忠心信徒作見證。我們在可靠之人的掩護下，來去就如陰魂。這時我已經有身上的疤痕，可以顯明無神論的邪惡，勉勵動搖的靈魂信靠神，靠主剛強。我指揮一個地下的傳道網，互相幫助。神遮蓋了共產黨的眼睛，讓我們得以廣傳福音。如果一個人可以那麼盲目，以至不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那麼他應該也不能看到一個基督徒正在傳道吧？

最後，警方對我活動和行蹤的不懈關注，終於得到了回報。我又被發覺，被捕入獄。不知何故他們這次沒有逮捕我的家人，可能是因為我廣為人知。我已經有八年半的坐牢記錄，釋放了幾年，如今再下牢五年半。

我第二次監禁比第一次更糟。我知道事情會這樣。我的身體幾乎馬上崩潰。但我們地下教會繼續在共產黨的監獄宣傳福音。

我們的協議：我們傳，他們打

正如當今在被奴役的國家一樣，在監牢裡嚴禁向其他的囚犯傳福音。犯規的就被毒打。我們中的一些弟兄決定為傳福音的特權付代價，所以我們接受了他們的條件。這是一筆交易：我們傳（福音），他們打（我們）。我們很高興地傳；他們很高興地打。大家都很高興。

以下的情況多次發生：一個弟兄向眾囚犯傳福音，守衛們忽然進來，把這弟兄拖去他們的“毆打室”。經過幾乎是無盡頭的毆打後，他們把他拖回來，丟在地上。這位弟兄滿身是血，慢慢掙紮著起來，整頓衣服問：“弟兄們，方才我說到哪裡了？”於是又繼續傳福音。

我已經看到了何等美麗的圖畫！

有時傳福音的是平信徒。這些簡樸的人得到聖靈光照後，常會傳達美麗的信息。他們全心投入自己的信息中，因為在這光景下傳福音，不是鬧著玩的。守衛們會忽然進來，把他們拖出去打個半死。

在各爾拉（Gherla）監獄，一位名叫格利古（Grecu）的基督徒被判的刑罰是——毆打至死。這過程長達數周。他被慢慢地打。他的腳底被膠棍毆打一下，獄卒就離開。幾分鐘之後他們再來棒打他一下，數分鐘後再一下。他的睪丸也被打。一個醫生給他一劑藥物，讓他得以恢復，又給他很好的食物，增加他的體力；然後再打，直到他死在這種不斷的毆打中。當時主導這種折磨的是一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叫雷克（Reck）。

在那期間，這位中委雷克對格利古說：“你要曉得，我便是神。你的生死在我手中，不在那天上之神的手中。一切都取決於我。我要你

活，你就活；我要你完蛋，你就完蛋。我才是神！”他就是這樣嘲諷基督徒。

格利古弟兄在這可怕的光景中，給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回答。這是後來雷克親口告訴我的。格利古說：“你不知道你說的非常有意義。每一條毛蟲，如果得到合適的生存條件，都會變成蝴蝶。你的受造不是為了作一名劊子手，卻是為了成為神一般的人，有神在你心中。許多像你一樣的兇手，就如保羅，都發現作一個暴徒是可恥的。他們發現他們可以做更好的事。於是他們就得著神聖的性情。耶穌對當時的猶太人說：

‘你們是神。’雷克先生，請相信我，你受造是為了像神一樣——有神的性情，而不是成為一個酷刑者。”

當時雷克並不理會這囚徒的話，就如大數的掃羅不在乎在他面前被打死的司提反。可是後來這些話在他的心中做工。雷克明白這是他的真使命。

共產黨的一切酷刑，毆打，和屠殺教給我們一項重要功課，就是：靈是肉身的主人。我們可以感覺到肉身被酷刑，但有時這酷刑好像很遙遠。我們的靈已經消失在基督的榮耀中，與基督同在。

當我們的糧食每天只有一碗汙湯，每週一片麵包時，我們決定繼續奉獻十分之一。每第十個星期我們就把這片麵包給那些身體比較軟弱的弟兄，當作是獻給耶穌。

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他們行刑前，允許他會見太太。他對太太最後的話是，“你必須知道，我雖然死了，但我還是愛那些殺我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我對你最後的要求是，愛他們！不要因他們殺了你所愛的而心中有苦毒。我們在天上再見。”這些話給一位當時在場的秘密警察的官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這官員也成了一個基督徒，並因此坐牢。這故事就是他在牢中告訴我的。

在提古奧納（Tirgu-Ocna）監牢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囚犯，名叫馬治維西（Matchevici）。他十八歲就入獄。由於酷刑，他患上肺結核。他家人聽到他的狀況，就送來一百瓶特效藥鏈黴素。監牢的政治官就召見馬治維西，對他說，“這是可以救你命的特效藥。可是監規不許你接受家屬送來的任何物品。我個人卻想幫你。你還年輕，我不想你死在牢中。

可是你也必須幫我一把。你必須給我提供一些針對其他囚犯的情報，我才能向上司解釋為何我特別通融你。”

馬治維西回答道，“我不想苟且偷生，在鏡子中看到自己成為出賣者的嘴臉。我不能接受這個條件。我寧願死。”那位秘密警察的官員立刻與馬治維西握手，說，“非常好！我也猜想你會這樣回答。但我有另一個提議。一些囚犯成了我們的線人（告密者）。他們說自己如今全心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也是共產黨員了。他們時常背後譏諷你。他們是兩頭蛇，叫人難以信任。我想知道他們的話有多可靠。對你來說，他們是出賣者，給你極大的傷害。我明白你不能出賣弟兄，但這些是出賣者。只要你給我們一些有關這種人的消息，你就可以救自己。”馬治維西立刻回答說：“我是基督的門徒。基督耶穌教我愛敵人。我不能以惡報惡。我不能給你任何有關他們的壞報告。我憐憫他們，為他們禱告。我不想與共產黨有任何聯繫。”馬治維西不久後就死在我的囚室裡。我看著他死——他臨終還歌頌神。愛征服了求生的本能。

如果一個窮人酷愛音樂，他會拿最後的一塊錢去買演奏會的門票。聽完了演奏後，他就連一分錢也沒有了。可是他卻不後悔：因為聽到了美妙的音樂。我也不後悔在監牢中喪失的時光，因為看到了美好的事物。我不過是監獄裡的一個軟弱弟兄，但卻有幸與偉大的聖徒和信心的英雄同室。這些人仿佛是初世紀的基督徒。他們樂意為基督死。他們屬靈的榮美無言語可形容。

我這裡說的只是平常的例子。在地下教會裡，不平凡的事蹟司空見慣，已如平常。地下教會是恢復到起初之愛心的教會。

入獄之前，我非常愛基督。在獄中，在見到了基督之新婦（祂的靈體）的真貌之後，我必須說我愛這地下教會就如愛基督祂自己。我看到這基督新婦的美麗，和她那自我犧牲的靈。

我妻子與兒子怎麼了？

我初次被捕後，不曉得妻子怎麼了。多年後我才聽到她也被捕下監。基督徒婦女在監牢受的，比弟兄更苦。少女們被殘酷的守衛強暴。那種褻瀆與汙穢難以形容。婦女們被逼做苦工、挖運河，她們的工作

量，與男人相等。她們在冬天挖泥。共產黨叫娼妓當工頭，這些娼妓競相折磨忠心的信徒。我太太曾吃草如牛，只為生存。饑餓的囚犯們抓運河中的蛇與鼠來吃。守衛們在星期日的娛樂之一，就是把婦女們丟下多瑙河，然後又把她們拉上來，嘲笑他們，譏笑她們濕漉漉的身體，再丟下河。我妻子也這樣被她們玩弄。

我的兒子在父母都被逮捕後，就流浪街頭。米海自小就非常虔誠，對信仰非常認真。他九歲時父母下牢，信心大受打擊。他心中苦澀，開始疑問他所信的宗教。他面對一般孩子在這年齡不會遇到的問題。他必須設法自己找吃的。

幫助基督徒囚犯的家人是一種大罪。兩位女士因為援助米海，就被逮捕遭毒打，終身跛足。另一個婦女因為讓米海住進她的家，就坐牢八年，罪名是幫助囚犯的家屬。她所有的牙齒都被踢掉，骨頭也被打斷，終身跛足，不能工作。

“米海，信耶穌！”

十一歲時，米海就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得以維生。苦難曾動搖他的信心。可是我太太監禁兩年後，米海獲許探監。他去到共黨的監獄，看到在鐵窗後面的母親，又髒又瘦，雙手滿了老繭，身上穿著破舊的監衣，以至他幾乎不能辨認。她的第一句話就是：“米海，信耶穌！”守衛們大大發怒，馬上把她拖走。米海哭著看到母親被拖走。這一分鐘決定了他的信仰。他知道如果在這情況下，一個人還可以愛基督，那麼這基督肯定是救主。後來他說：“如果基督教沒有其他支持它的理由，僅僅因為我母親相信它，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這是米海真正接受基督的一日。

在學校，米海必須不斷為生存而戰。他是一位好學生，於是獲得一條紅領巾——成為共產主義少先隊員的標誌。我兒子說：“我絕不會佩帶這紅領巾，因為共產黨把我的父母關在監牢。”他因此被開除。一年後他再度入學，這次他隱瞞父母親的身份，不讓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囚犯的兒子。

後來他必須寫一篇反對聖經的論文。他就寫道，“反對聖經的論點薄弱，引用聖經的話也不真實。那位教授肯定沒有讀過聖經。聖經與科學其實沒有衝突。”於是他再度被開除，這次失學長達兩年之久。

最後他獲得進入神學院學習。但這裡教的是“馬克思主義神學”。每一件事物都按照馬克思的思想，加以解釋。米海公開異議，同學們也都支持他；於是他又被開除，不能完成神學學業。

有一次，一位教授演講無神論；我兒子站起來反駁教授，質問那教授誤導這麼多青年，該當怎樣的責任。全班都支持我的孩子。在這種場合，必須有一人敢發問，其他人方能回應。為了得到教育，米海必須隱藏自己是基督徒囚犯魏恩波的兒子。但不久總是被發覺，於是又被叫到校長辦公室，又被開除。

米海也大受饑餓之苦。共產國家基督徒囚犯的家人都挨餓，幾乎要死；幫助他們便是滔天大罪。

我告訴你一個我所熟悉的基督徒家庭受苦的例子。一位弟兄因為地下教會的活動，被捕入獄，留下太太和六個孩子。他的長女十九歲，次女十七歲，都無法得到工作。共產國家的唯一雇主就是黨方。他們不給基督徒囚犯的孩子任何職業。請不要按照道德的標準來審判這事，只接受這個事實：這兩位基督徒少女，為了養育年幼的弟妹和生病的母親，就成為妓女。他們十四歲的弟弟看到這事，就發瘋了，被送去精神病院。當那父親多年後釋放回來，他的唯一禱告就是，“神哪，讓我再回監牢去。我實在無法忍受看到這樣的事。”他的禱告獲得應允，他因為向孩童傳福音而再度坐牢。他的女兒們也不再從事淫業，獲得了工作，條件是：接受秘密警察的要求——成為警方的線人。由於她們是殉道者的女兒，每個家庭都尊敬接受她們。她們就把聽到的一切向秘密警察報告。不要說這事醜惡和不道德——它當然醜惡——可是也要自問，是不是因為你的罪（因為你這自由人沒有幫助這些基督徒家庭，以至他們孤單無援），所以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第三章 被贖獲釋，到西方工作

我在監牢一共度過十四年。那些年間，我不能讀到聖經或任何書籍。我已經忘了如何書寫。由於極端的饑餓，酷刑與藥物，我連聖經的經文也忘光了。可是在我坐監滿了十四年的那一天，這句話就從遺忘中出現在我腦中：“雅各就為拉結服事了七年。他因為深愛拉結，就看這七年如同幾天。（創世紀 29 章 20 節）”不久，我國進行大赦，我就獲釋放，這該歸功於美國的公眾輿論。

我重見妻子。她忠心等了十四年。我們在極端貧困中開始我們的新生活。因為在我國，被逮捕的人原來所擁有的一切物品都被充公了。

出獄的牧師神甫可以獲得牧養一個小教會。他們分發了歐索瓦城（Orsova）的一個教會給我。共產黨的異端部門告訴我說，這所教會擁有三十五名會員，我不得使它變成三十六名！他們又說，我必須成為他們的線人，向秘密警察報告每一個會員的狀況，同時也不得接觸年青人。共產黨就是這樣利用教會作為他們控制人的工具。

我知道如果我傳道，就會有許多人來聽。於是我完全不嘗試在官方教會講道。我重新從事地下教會工作，分擔其中的美好與風險。

在我入獄年間，神奇妙地工作。地下教會不再被拋棄或遺忘。西方教會開始幫助我們，也為我們禱告。

一天下午，我在某省城的一個弟兄家裡休息。他喚醒我說，“國外的弟兄來了。”西方基督徒沒有忘記或拋棄我們。平信徒已經開始秘密援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屬，又暗中送來基督教的讀物。

我在隔壁房間就見到六位這樣的外國的弟兄。我們談了好久後，他們才對我說，聽說在這裡住著一位曾經坐牢十四年的弟兄，他們想要見他。我回答我便是那弟兄。他們說：“不是吧？我們應該會見到一個愁眉苦臉的人，而不會是一個興高采烈像你一般的人。”我向他們保證這人確實就是我。我喜樂是因為知道他們的到來以及我們不再被遺忘。從那時開始，地下教會就得到穩定的幫助。我們秘密獲得許多聖經、基督徒讀物、和給殉道者家人的救濟。地下教會的工作得以更有效地開展。

他們不單帶來神的話，也給我們看到他們的愛心和帶給我們的安慰。在洗腦年間，我們不斷地聽到“再也沒有人愛你，再也沒有人愛你，再也沒有人愛你。”如今我們看到英、美基督徒冒著生命危險前來幫助我們，這足以證明他們愛我們。後來，我們也幫助他們發展秘密工作的技巧——他們可以潛入被秘密警察包圍的房屋而不被警察發覺。

偷運進來的聖經的價值，不是英、美基督徒所能明白的。因為在英美聖經多如牛毛，人們不知道珍惜。

如果沒有外國基督徒的物質援助和禱告，我的家庭和我就不可能生存。許多共產國家的地下教會的牧師與殉道者也是這樣。我自己的經歷見證了自由世界給與我們的支持，不單是物質的，更是精神上的。他們就如神差來的天使！

由於地下教會重新活躍，我大有可能第三次被捕。這時兩個基督徒機構——挪威猶太人宣道會，和希伯來基督徒聯盟——為我向共產政府付款一萬美元的贖金（這是一個普通政治犯贖價的五倍），使我得以離開羅馬尼亞。

我為什麼離開共產主義羅馬尼亞

如果不是地下教會的領袖要我利用這個機會出國，成為地下教會向自由世界的呼聲，我就算面對危險，也不會離開本國。他們希望我告訴你們有關他們的苦難與需求。我人雖到了西方，可是我的心還是與他們同在。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急切需要曉得地下教會的苦難與勇敢事工，我決不會離開羅馬尼亞。但這是我的使命。

在離開羅馬尼亞之前，秘密警察兩次把我叫去。他們說已經收到我的贖金（共產主義在羅馬尼亞造成的經濟危機，迫使我國開始出售公民來增加收入）。他們對我說：“你到西方，怎麼傳基督都可以，只是不許招惹我們！不許說一句反對我們的話！坦白對你說，如果你提及我們（如何對待地下教會），我們只須 1000 美元就能找到一個黑幫殺手把你殺了，或者把你綁架回來。”（我曾經在監牢裡與東正教的主教瓦西列·列烏爾 Vasile Leul 同室，他就是從奧地利被綁架，帶回羅馬尼亞。他的指甲全都被拔掉。與我同監獄的也有一些是從柏林被綁架來的

羅馬尼亞人。義大利和巴黎也有羅馬尼亞人遭綁架的。) 他們又說：

“我們也可以說一些有關你與某一位少女的桃色新聞，或偷盜財物，或一些你年輕時所犯的罪，以摧毀你的道德聲譽。西方人最容易上當，尤其是美國人。”

威脅之後，他們就讓我來到西方。他們對自己的洗腦很有信心。在西方有許多受過洗腦的東歐人，如今都保持緘默。其中一些以前受過共產黨酷刑的人現在甚至稱讚共產主義。共產黨肯定我也不敢發聲。

於是在 1965 年 12 月，我們全家就被允許離開羅馬尼亞。

在我離開之前，我最後做的一件事便是到一位上校的墳墓，放上一束鮮花。這名上校曾下令逮捕我，給了我多年的酷刑。我這樣做，是表示我要全身心投入，把我所擁有的基督的喜樂帶給心靈空虛的共產黨員。

我恨共產黨的體制，但我愛它的人。我恨惡罪，但愛罪人。我全心愛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可以殺害基督徒，卻不能消滅基督徒對他們這些兇手的愛。我對共產黨員並向我施刑的人，沒有一丁點兒的苦毒或怨恨。

第四章 以基督的愛，擊敗共產主義

猶太人中有這樣一個傳說，當他們的先祖過了紅海，埃及追兵們卻被淹沒在海中時，眾天使也與以色列人一同歌唱得勝的凱歌。神對天使們說：“猶太人是人，脫離了追兵，當然歡樂。但我卻指望你們能更明白我的心情。埃及人不也是我造的嗎？我不也愛他們嗎？你們怎麼不能感受到我對他們悲慘結局的悲傷呢？”

約書亞記 5 章 13 節記載：當“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如果約書亞遇到的只是一個人，他的回答只能是：“我幫助你，”或“我幫助你的敵人，”或“我是中立的。”一個世人對約書亞的問題，只能這樣反應。可是約書亞遇到的“那位”，卻是從神而來，於是祂的回答最出乎意外，也最難理解：“不是的。”這是什麼意思？

祂來自一個沒有支持或反對的地方。在那裡每個人和每樣事都獲得諒解、同情、憐憫、與愛。

在人的層面，我們必須與共產主義爭戰。在這個世界我們也必須反對共產黨，因為他們是這種殘酷、野蠻理想的支持者。

但基督徒不單是人，也是神的兒女。他們有屬天的性情。為這緣故，在共產監獄受到的酷刑不能使我憎恨他們。他們也是神所造的，我怎能恨他們？但我也不能成為他們的朋友；朋友意味兩人一心（二人同心）。我與共產黨員並不同心。他們憎恨神的名號；我卻愛神。

如果有人問我，“你支持共產黨，或反對共產黨？”我的回答將會是複雜的。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大威脅，我完全反對它，要與它爭戰，直到它完全垮臺。但在靈裡，我正在天上與耶穌同坐，我坐在“不是的”的範圍內。在那裡，儘管他們犯下了所有罪行，共產黨員還是可以被瞭解，也可以被愛。在那裡，天上的活物嘗試協助每個人達到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基督的樣式。於是我的目標便是向共產黨員傳福音，把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帶給他們。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祂愛共產黨員。祂曾說祂愛每一個人，又寧可拋下九十九隻公義的羊，去尋找那迷失的一

隻。眾使徒和一切基督教的偉大教師們都奉祂的名教導這普世之愛。聖馬卡力（Macary）說，“如果一個人熱愛所有的人，只是不能愛其中的一位，那麼這人就不是基督徒，因為他的愛並不包括所有的人。”聖奧古斯丁教導說，“如果所有的人都公義，只有一個罪人，那麼基督也會來承受同樣的十字架，只為救那人。祂是那麼地愛每一個人。”基督徒的教訓十分清楚。共產黨員也是人，基督也愛他們。每一個與基督同樣性情的人也愛他們。我們愛罪人，雖然我們恨惡罪。

我們曉得基督愛共產黨員，因為發現我們自己也愛他們。

我曾親眼看到在共產黨監獄裡的基督徒，有的腳上綁著五十磅重的鐵鍊；有的身體被熱鐵刺入；有的喉嚨被強行灌鹽，且之後不得水喝；有的受饑餓、遭鞭打、關冰室——卻依然為共產黨員熱切禱告。這不是人類思想所能理解的。這是基督的愛從我們心中湧流而出。

由於黨內鬥爭，共產黨員在酷刑我們之後，常常自己也被關入牢房。在共產制度下，共產黨員，包括共黨領袖，下監是平常的事。不久前還是施刑的官員，如今竟會成為囚犯，與他們毆打過的人同關一室。非基督徒囚犯們憎恨他們，痛打這些以前的審判官。基督徒就保護他們，甚至連自己也被打。人們還誤以為這些基督徒成了共產主義的幫兇呢！我又曾看見基督徒把自己僅有的一塊麵包（那時我們每個星期僅得到一塊麵包）和救命的藥物也給一個生病的前共產施刑者，如今的囚犯。

羅馬尼亞的基督徒，前總理尤留·馬紐（Iuliu Maniu），在共產黨上臺後被下監，後來死在監獄中。他最後的話是：“如果共產黨在我國倒臺，每個基督徒最神聖的任務就是到街上去，走上街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護共產黨人，使他們免於被那些自己曾經壓迫過的群眾的正義憤怒所傷害。”

在我悔改的最初日子，我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每逢在街上看到一人路過，我就心如刀割，因我不知道這人是否得救了。如果一個會友犯罪，我會痛哭幾個小時。我渴望每個人得救，包括共產黨員。

在單獨牢房，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地禱告。我們非常饑餓；又被藥物麻醉，幾乎成了傻瓜。我們軟弱如教室裡吊著的骸骨。主禱文太長

了，我們不能集中精神念完它。我唯一的禱告是重複地說，“耶穌，我愛你。”

然後，在一個榮耀的日子，我得到了耶穌的回答：“你愛我嗎？如今我就向你顯示我如何愛你。”頓時，我感到心中燃起一團火焰，像太陽的日冕條帶般燃燒著。去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門徒曾說，當耶穌對他們說話時，他們心是火熱的。我也如此。我認識到那在十架上捨命者的愛。這愛包容一切的人，包括共產黨員，不論他們如何罪大惡極。

共產黨員雖然一直不斷地作惡，但“愛情如死之堅強，妒恨如陰間之殘忍。…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雅歌 8 章 6, 7 節）就如陰間要吞滅一切人——不論貧富、老幼、種族、國籍、政治信仰、聖徒或匪徒——愛也是。基督是愛的化身，祂要所有人都歸向祂，包括共產黨員。

一個被嚴刑拷打的傳道人被拋進我的囚室。他已半死不活，臉上和身上都流著血。我們為他清洗。一些囚犯就咒罵共產黨員。這位傳道人卻呻吟著說：“請不要咒罵他們！請保持安靜！我要為他們禱告。”

我們如何喜樂——哪怕是在監獄裡

我回顧十四年的監獄生活，偶爾也有非常歡樂的時光。其他的囚犯，甚至是守衛，常驚訝基督徒為何在可怕的處境也喜樂。我們不能被阻止歌唱，就算是因此被毆打。我想一隻夜鶯，就算知道自己在唱歌之後，就會被殺，它依然會唱。基督徒在牢中為歡樂而舞。他們怎麼能在如此悲慘的環境中這樣喜樂？

我在監中常想到耶穌對祂門徒的話：“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路加福音 10 章 23 節）。那些門徒剛走過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是個被壓迫的國家，到處可見大受當局暴政的人民。他們又看到疾病、瘟疫、饑餓、憂愁。他們進入人家，只見哀哭的父母或妻子，因為愛國的壯年人都被抓去坐牢了。這可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美麗世界。

但耶穌依然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眾門徒不單看到苦難，也看到了救主。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幾隻醜陋的，爬

行在葉子上的毛毛蟲（門徒），發現自己經過一段可憐的日子後，就會變成美麗的蝴蝶，飛舞在花叢中。這種幸福也是我們的。

我四圍也有不少像約伯一樣的人，有一些遭受的甚至比約伯更苦。但我知道約伯在末了得著雙倍的福分。我周圍也有可憐的拉撒路；每天挨餓，渾身生瘡。但我知道天使們會來把他們帶到亞伯拉罕的懷裡（參路加福音 16 章 20-22 節）。我看到了他們未來的樣子。我今天所看見在我周圍的這些破舊、骯髒、軟弱的殉道者，明天就是頭戴榮耀冠冕的聖徒。

我看到他們就如他們將來所是，而不是現在如何。在逼迫的人中，我也看到大數的掃羅——將來的使徒保羅。這些逼迫者，有些已經開始轉變了。有些我們向他們見證基督的秘警官員已經成了基督徒；而且歡喜為基督的緣故而入獄。在鞭打我們的獄卒中，有些就如從前鞭打保羅的腓利比獄卒。我們夢想有一日他們會問：“我當怎麼行，才能得救？”那些把基督徒綁在十架上，又用人糞塗抹，加以嘲笑的；我們看到他們可能就如各各他山上嘲笑基督的人群，不久就為他們的罪捶胸悔改。

我們在監獄裡看到共產黨員得救的希望。也是在牢中我們才認識到自己對他們的責任。我們是在被他們酷刑後，才曉得要愛他們。

我許多親屬被共產黨員殺死。可是這些兇手們後來就在我家中（一個最合適的地方）悔改。所以，在共產監獄裡基督徒就有了向共產黨員傳道的使命。

神看事物，不同我們；就如我們看事物，有異於一隻螞蟻。從人的角度看，被綁在十架上，全身灑滿排泄物，真是悲慘極了。但聖經卻說這是“輕的折磨”。對我們來說，關在監獄十四年是很長的一段時期。但聖經卻說這不過是“轉眼之間”，並告訴我們“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哥林多後書 4 章 17 節）。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共產黨的罪行，在人眼中，是不可原諒的，但在神看來不過是輕微的。他們的暴政，雖然已經長達整個世紀，但在視千年如一日的看來不過是短暫的誤入歧途。共產黨員還有得救的可能。

天門並沒有對共產黨員關閉。天光也沒有向他們熄滅。他們可以像任何人一樣悔改。我們必須喚醒他們。

只有愛能改變共產黨員和恐怖分子（這愛有別於非基督徒的哲學家，和許多所謂的教會領袖）。憎恨使人盲目。希特勒的反共是出於憎恨。於是他不但沒能征服共產黨，倒促使共產黨吞滅了三份之一的世界。

我們在監牢裡以愛心設立一個機構，專向共產黨員傳道。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共產黨的領袖們。

一些宣道會主任似乎沒有讀過教會歷史。挪威如何接受基督？因為他們的國王奧力（Olaf）先接受主。蘇聯的國王威拉底米（Vladimir）接受了福音，蘇聯全國就歸信。匈牙利全國也跟隨他們的國王聖司提反（St. Stephen）信主。波蘭也是。在非洲，當部族首領歸主後，全族就跟從。我們的傳道會卻轉向一般人。這些人可能成為非常好的基督徒，卻不能左右大局。

我們必須贏得統治者：不單是政治領袖，也包括經濟、科學、藝術的要人。他們塑造人類的靈魂。得著他們，就得著他們影響的眾人。

從宣教的角度看，共產主義有一個特點，是民主制度沒有的，就是中央集權。如果一位美國總統成為摩門教徒，美國不會通國都歸信摩門教。但如果共產國家的領袖們成了基督徒，就可能得到全國。領導者的影響力就是如此之大。

共產領袖們可能悔改嗎？肯定能，因為他們並不開心，也沒有安全感，就如被他們折磨的人一般。幾乎所有的蘇聯共產領袖都被自己的同志們監禁或槍斃。中國也一樣。蘇聯內長雅果達（Iagoda），億朔

（Yezhov），伯利亞（Beria）等人，似乎一度權力傾城，結果也像反革命分子一樣：被一枚子彈打入頸項，完結生命。幾年前，蘇聯的內長述利賓（Shelepin），並南斯拉夫內長蘭克威（Rankovic），也都像髒布一樣被拋棄。

我們如何在靈裡進攻共產主義

共產政權讓任何人都不快樂，連獲利於這主義的黨員本身也不快樂。他們害怕秘密警察的麵包車可能在任何一個晚上開到他們的府上，把他們帶走——只因黨方突然決定改變他們的路線！

我認識好些共產領袖，都充滿壓力。只有耶穌能給他們安息。

得著共產領袖歸主，可能意味著拯救世界脫離核災難，也意味著拯救世界脫離饑饉，因為當今世界把那麼多資源投在昂貴的軍備上。得著共產領袖，可能意味著結束國際緊張，也意味著給基督與眾天使大喜樂。在宣教事工艱苦的地帶，就如新幾內亞或馬達加斯加，如果共產領袖歸主，宣教就得著全新的動力，國民就可能歸信。

我認識一些悔改了的共產黨員。我自己年輕時也是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悔改了的無神論者和共產黨員十分愛基督，因為他們曾經大大地犯罪。

宣教事工必須有戰略思考。從救恩的角度看，每個靈魂都相等；但從宣教策略的角度，卻不相同。得著一個大有影響力的人，比得著一個山林的野人更有價值。前者歸主後，可以影響千萬人；後者只能一人（或一家人）得著救恩。於是耶穌並不在小鄉村結束自己在世的職事，卻選擇在世界屬靈的首都耶路撒冷。為同樣的緣故，保羅極力前往羅馬。

聖經說：“女人的後裔要傷你（蛇）的頭。”（創世紀 3 章 15 節）我們卻只在蛇肚上輕輕搔癢，使它哈哈大笑。今天，這毒蛇繼續爬行在中國、北韓、越南、老撾。在中東仍有一些國家不允許建立任何基督教堂。教會領袖，宣教主任，並一切有思想的基督徒必須考慮解決這些被奴役國家的困境。

我們必須放棄得過且過的例行工作。“懶惰為耶和華行事的，必受咒詛。”（耶利米書 48 章 10 節）教會必須在靈裡給黑暗國度的執政掌權者迎頭痛擊。從來沒有一場戰爭單憑防守就能取勝。要勝利，就必須進攻。

詩篇 107 章 16 節說，神“打破了銅門，砍斷了鐵門。”對神來說，共產黨的鐵幕就如兒戲。

初期教會使用秘密方式，非法操作，而且得勝。我們必須效法和借鑒他們的方式。

過去我一直不能明白為何新約的許多人，不用正名，只用外號：西面又稱為尼結（使徒行傳 13 章 1 節），約翰又叫馬可，等等。直到共產主義時代我才恍然大悟。如今，在被奴役國家做工，我們也用別名。

過去我不明白耶穌安排一個晚餐，為何不給明確的位址，卻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馬可福音 14 章 13 節）現在我明白了。如今地下教會也用類似的暗號來工作。

如果我們同意回到初期教會的工作模式，我們就可以在這些極權的國家中有效的工作。

但我卻遇見一些西方教會領袖，他們非但不愛共產黨員（若愛他們，他們早就會在共產國家成立宣教機構了），他們制定的政策反而站在共產黨一邊。對馬克思家中失喪的靈魂，他們也沒有好撒瑪利亞人擁有的憐憫之心。

人們真正相信的並不是他們在信仰宣言中所背誦的內容，而是他們願意為之獻身的東西。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們已經證明瞭他們願意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我們的國際宣教網路今天仍在受壓迫的國家中秘密運作。如果被發現，就可導致監禁、折磨、甚至死亡。我相信我所寫的一切。

我有權問：那些與共產主義交朋友的美國教會領袖們會準備為他們的信仰而死嗎？有誰阻止他們放棄西方的高位，成為東方的官方牧師，在那裡——當場——與共產黨合作？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個西方教會領袖證明有這樣的信心。

人類語言的產生，是為了溝通和傳達彼此之間的感情。但人類語言卻不足以傳達有關神的奧秘與屬靈生命的高度。同樣的，也沒有人類的語言能表達魔鬼的殘酷。你能形容一個快要被丟入納粹火爐之人的感受嗎？或，你能形容一個人看到自己孩子被拋進這火爐的感受嗎？

於是嘗試形容基督徒在共產黨手下遭受的折磨，也同樣不可能。

我曾經與盧克雷齊烏·派特拉什卡努(Lucretiu Patrascanu)同囚。他是把羅馬尼亞赤化的第一功臣。他的同志們給他的報答卻是把他抓去精神病院（雖然他完全沒有精神病），與瘋人關在一起，直到他也瘋了，就把他投入監獄。他們對待前外交部長安娜·包克(Ana Pauker)，也是如此。基督徒也常受這種折磨。他們被電激，被強制穿上用於限制精神病人身體活動的直筒夾克(Straitjackets)。

當世界聽到紅衛兵在中國街頭的暴行，都大為震驚。現在試想一下在外人無法看到的中國監獄裡，基督徒的光景如何。我聽說一位有名的中國福音派作家和其他信徒拒絕否認自己的信仰，當局就把他們的耳朵、舌頭和腳都切掉。中國監獄裡現在仍然關押著基督徒。

但共產黨最可怕的還不是他們折磨和殺死人的肉體。他們無可救藥地誤導人的思想，荼毒青年與兒童。他們把自己的黨員安插在教會的領導層，為要毀壞教會。他們教導青年人不要信神或基督，倒要憎恨這些名。

我們可以怎樣形容這種悲劇：當一個基督徒被監禁多年後回到家裡，卻被自己的孩子們藐視譏笑。共產黨在基督徒們坐牢時，已把他們的孩子們變成激進的無神論者。

這本書與其說是用墨水寫成的，不如說是用受創傷的心所流的血寫成的。

但就如但以理書所記載的：他三個年輕朋友從火爐出來後，身上沒有火燎的味道；經過共產監獄的基督徒也沒有一點憎恨共產黨員的味道。

如果你壓碎一朵花，它就給你芬香。同樣的，基督徒在被共產黨員酷刑之後，就給施刑者真誠的愛。我們把許多獄卒帶到基督跟前。我們只有一個願望：把我們最好的東西，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救恩，給那些折磨我們的共產黨員。

我個人沒有為主殉道的福氣，像其他的殉道者一樣。我獲得釋放，甚至得以離開羅馬尼亞來到西方。

在西方，我發現許多教會領袖的觀點與竹幕和前鐵幕後的地下教會的主要觀點截然相反。西方的許多基督徒對那些受壓迫國家的人們毫無愛心。證據是：他們沒有為這些人的救贖做任何事情。他們的傳教只是為了勸說基督徒從一個教派改信另一個教派。他們沒有意願去受壓迫的國家傳福音，認為這樣做是“違法的”。他們並不愛這些人。否則，他們早就像威廉·凱裡愛印度人、戴德生愛中國人那樣，創建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宣教事工。

但是他們對受壓迫國家的人們缺乏愛心，不為基督贏得他們的靈魂，這還不是最嚴重的。通過他們的自滿、疏忽、行為（有時實質上成

了共產黨的同謀)，一些西方教會領袖使不信神的人更加不願意來信主。他們幫助共產主義者滲透西方教會並在世界各地的教會中篡得領導地位。他們也使基督徒對共產主義的危險毫不知情。

除了不愛共產黨員，不為基督贏取受壓迫國家的人們之外（西方教會的藉口是共產國家不容許傳福音；仿佛初期教會的基督徒是得到了尼祿皇帝的允許，方才傳福音），這些西方教會領袖也不愛自己的羊群，因為不允許他們參與世界各地的屬靈爭戰。

遺忘了的歷史教訓

在第一世紀，北非的基督教興旺。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賽伯里昂(St. Cyprian)，聖安塔那修(St. Athanasius)和特土良(Tertullian)都來自該地。可惜北非的基督徒忽略了一個責任：向回教徒傳福音。結果是回教徒征服北非，剷除當地的基督徒，長達數個世紀。直到現在，北非還是屬於穆斯林，被基督教宣道會稱為“無法傳道的地帶”。讓我們從歷史吸取教訓吧！

在宗教改革期間，胡斯(Huss)、路德(Luther)與加爾文(Calvin)的改教意圖，與歐洲百姓希望擺脫教皇枷鎖的心願相符（那時教皇權力甚大，壓迫多國的政治與經濟）。如今也相仿，地下教會向極權國家的受害者傳福音的心願，正與所有自由人民希望繼續在自由中生活的心願相符。

許多極權國家擁有核武器。使用軍事力量對付他們，就必引起新的世界大戰，導致億萬傷亡。許多西方領袖也已經被洗腦，完全不想推翻極權統治。他們自己也常這樣說。他們只希望要剷除毒品、黑幫、癌症、肺結核等，而不是罪惡的共產主義制度。他們不曉得共產主義殺的人，遠超以上這一切的總和。

蘇聯作家伊利亞·艾倫堡(Ilya Ehrenburg)說，如果史達林一生不做任何其他工作，只須抄一遍被他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他一輩子也寫不完。赫魯雪夫(Khrushchev)在共產黨第二十大的會中說，“史達林清算了千千萬萬誠實無辜的共產黨員——在一百三十九名於第十七大選

出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人中，有九十八人，就是百分之七十，後來被捕槍斃（被史達林清算）。 ”

且想像他會怎樣對待基督徒！赫魯雪夫否決了史達林，可是他自己卻繼續同樣的暴行。在 1959 年還開放的教堂，他上臺後，就再關閉其中的一半。

在中國，野蠻的浪潮比史達林時期更甚，公開的教會生活完全中止。蘇聯和羅馬尼亞也有新一波的逮捕。（蘇聯共產主義倒臺後，當局向大眾承認大舉逮捕過蘇聯基督徒。）

當時的共產國家共擁有十億人口。通過恐怖和欺騙手段，他們把整整一代年輕人培養成仇恨一切西方事物，尤其是仇恨基督教的產物。

在蘇聯時常可以看到當地的官員站在教堂門口監視兒童。凡到教會的兒童就被扇耳光並被攆出去。他們正在精心地、系統地培養著毀滅西方基督教的下一代！

只有一種力量能夠推翻邪惡的政府：就是那以基督教國家取代異教的羅馬帝國的力量；把野蠻的鐵器時代的條頓人(Teutons)以及海盜時代的維京人(Vikings)變成基督徒的力量；推翻血腥的宗教裁判所的力量。這就是福音的力量，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地下教會便是它的代表。

支持這個教會並幫助她，不僅僅是與受苦弟兄團結的問題。這關係到你的國家和你的教會的生死存亡。不單單自由國家的基督徒要支持這個教會，政府的政策也應當調整。地下教會已經使共產黨統治者皈依基督。羅馬尼亞的首相喬治烏·德治(Gheorghiu Dej)在死前已經是一個悔改了的人。他承認自己的罪，同時不再繼續自己過去的罪惡。在許多共產主義國家，都有一些政府成員是秘密的基督徒。這種現象正在蔓延。然後我們就能期待一些政府政策的真正改變——不是像(前南斯拉夫共黨領導人)鐵托(Tito)和(前波蘭共黨領導人)哥莫爾卡(Gomulka)那樣的換湯不換藥，仍繼續著殘酷無神論政黨的統治——而是朝向基督教和自由的轉變。

如今就有非常難得的機會。

不少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就如基督徒敬虔信基督一樣）如今正面對一大危機。他們曾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創造國際世界大同。如今他們卻看到共產主義的東方陣營國家分崩離析。

他們曾經真的相信共產主義會創造一個人間天堂，而不是一個烏托邦（夢幻天堂）。如今他們看到自己的人民挨餓，小麥必須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北朝鮮的饑荒就是這種情況。作為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北朝鮮目前正處於物資徹底崩潰的邊緣。洪水摧毀了農作物，徹底破壞了他們的糧食供應。出於極度的絕望，北朝鮮不得不把視窗和大門略為打開一條縫，讓世界其他國家可以稍微窺見一些被關在鐵絲網後面的東西。

共產黨員曾經十分相信自己的領袖。如今他們從自己的報紙讀到史達林是一個大屠殺者；赫魯雪夫是一個傻瓜；國家英雄就如拉可西(Rakosi)、幾羅(Gero)、安娜·包克(Anna Pauker)、蘭可維司(Rankovici)等，也都是一文不值。共產黨員不再相信他們的領袖們是絕對無誤的事實。他們如今就如失落了教皇的天主教徒一樣。

共產黨員的心中有一個空洞。這空洞只有基督才能填滿。人的內心本能地尋求神。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屬靈的空洞，直到被基督填滿。這對於共產黨員和其他被奴役的國家的人也是如此。在福音中，有一種愛的力量也可以打動他們。我曾親眼見證它的發生，我知道這是可能的。

基督徒在被共產黨員戲弄與酷刑之後，很快就遺忘並饒恕了共產黨員對他們個人與家庭所造成的傷害。他們盡力幫助共產黨員脫離危機，找到基督。為此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

基督徒的愛並不分黨派。耶穌說，神使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基督徒的愛也是如此。

西方基督徒領袖說，耶穌教我們愛敵人，於是他們就與共產黨和其他極權統治者友好。但耶穌從來沒有教我們只愛敵人，而忘了弟兄。

他們與那些雙手沾滿基督徒鮮血的人一同宴飲，而不向這些兇手們傳福音，以為這便是愛。而那些被這種極權者壓迫的人，則完全沒人理、沒人愛。

幾十年前，西德福音派教會與天主教會出資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救濟饑民。美國基督徒資助更多。

許多人挨餓；但我不能想像有誰比基督徒殉道者家屬更饑餓。他們也最配得到自由基督徒的幫助。如果德國、英國、美國、和北歐的眾教會籌集救濟資金救濟饑民，首先應該救濟的是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屬們。

可是他們得到救濟了嗎？

我是由兩個基督徒機構買贖出來的，證明當時我國的基督徒是可以被買贖的。可是我卻是羅馬尼亞唯一獲得西方教會買贖的基督徒。這證明西方教會忽略了許多其他當得幫助的基督徒。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們自問，神呼召他們，是要他們單救猶太人，或也救外邦人？他們獲得了正確的答案。二十世紀也出現相似的問題：基督教不是單為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基督不是僅屬於美國、英國、和其他民主國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一手伸向西方，另一手向東方。祂不單祈望成為猶太人的王，也切望成為外邦人、共產黨員、和西方世界的王。祂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 16 章 15 節）”

祂為所有的人流血，所有人都當聽到這福音。

鼓勵我們在被奴役的國家傳福音的是，那些成為基督徒的人充滿了愛和熱情。我從未遇到過一個冷淡的蘇聯基督徒。年輕的前共產主義者和前穆斯林都成為基督傑出的門徒。

基督愛這些人，願意釋放他們；就如祂愛眾罪人，願意釋放他們脫離罪。一些西方教會領袖卻放棄這個唯一正確的態度，取而代之，姑息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們偏袒這些罪人，幫助這些迫害者維持他們的權力，從而不但攔阻了這些人的得救，也攔阻了受他們迫害的人得到救恩。

我獲得釋放後，找到了什麼？

我出獄與妻子團圓後，妻子問我將來的安排。我說：“我希望退隱安息。”我太太說她也希望這樣。

我少年時非常激進，外向。但監獄，尤其是多年的單獨囚禁，把我轉變成一個默想型人物。我心中一切的風暴都止息了。我不再理會共產主義，甚至不曾察覺它。我正在天上新郎的懷抱裡，為那些折磨我們的人禱告，全心愛他們。

在牢中我幾乎已經放棄任何可能被釋放的希望。只是偶爾我也會想到，如果獲得釋放，我會作什麼。我常想到我會遠遠離開眾人，到一個沙漠去繼續享受與天上新郎的甜蜜交流。

神是“真理”。聖經是“談及那‘真理’的真理。”神學是“論及有關那‘真理’之真理的真理。”基督徒生活在這許多關於“真理”的真理中，正因如此，反而失去了“真理”本身。我們在牢中挨餓、毆打、被下藥，以至忘卻了一切神學教義和聖經。我們忘了有關“真理”的眾真理，於是就活在“真理”中。經上寫著說：“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馬太福音 24 章 44 節）在我們受刑最黑暗的時刻，我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人子就來臨，照亮監獄，四壁發光如鑽石。施刑的人似乎站在遠處的肉體中。但在靈裡，我們與主一同歡樂。這種喜樂遠勝過住皇宮酒店。

我從沒想過與人或事相爭。我不願意再戰鬥，包括為正義而戰。我只願意為基督建立靈宮。我出獄時只希望有一個平靜的晚年。

但我出獄後，卻看到共產主義的另一面，比我在監獄受的折磨更糟。我在各宗派遇到一個又一個大牧師、大傳道、甚至主教，憂傷地向我承認他們已經成為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是針對他們自己的羊群。我問他們是否準備不計個人安危，放棄這種行為。他們都說不能。原因倒不是為了自保，卻是因為如果他們拒絕告密，他們的教會就會被關閉。這是我下牢之後才開始的新變化。

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名來自秘密警察的政府代表，掌控一切“異端邪教。”這人隨時都有權傳召任何一個牧師，查問他教會的出席名單、誰常領聖餐、誰熱心信仰、誰善於贏取靈魂、人們告解（認罪）的是什麼，等等。如果你不回答，你就被趕走，另一個比你更會說話的“傳道人”就替代你的位置。如果當局找不到這樣的人（這種人決不難找），就關閉那教會。這也發生在今天的中國。

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會向秘密警察報告，所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做的很勉強，總是嘗試隱藏一些事物；另一些則習以為常，良心不再責備了；還有一些已經養成一種熱情，把不需要報告的也說出來。

我聽到基督徒殉道者的孩子們向我承認說，他們被逼向當局舉報善意幫助他們的人；不然他們會被停學。

我參加一個浸信會的大會。這大會高掛著紅旗；共產黨在這裡決定誰該成為“公選的領袖”。我曉得每一個官方教會的頭頭都是共產黨委任的。我意識到我見到了耶穌說的“行毀壞可憎者”。

歷代以來，總會有好的和不好的牧者。但中央委員會——一個無神主義政黨，它的最終目的是摧毀宗教——指定教會領袖的現象，還是頭一次出現。這些領袖們領導教會的目的是什麼？當然了，就是幫助把宗教連根拔除。

列寧寫道：“每一種宗教理念，每一種關於神的觀念，甚至只是稍為想到有關神的念頭，都是最危險的難以言喻的卑鄙，是最可憎的精神傳染病。千千萬萬的罪惡、汙穢、暴力、並物體的傳染病，都遠比對神的一種微妙而屬靈的觀念更安全。”

蘇聯的共產黨都是列寧派。他們認為宗教比任何癌症，肺結核，或梅毒更為可怕。他們決定誰人可以當宗教領袖。於是官方教會的領袖，或多或少都與他們妥協。

我看到孩童與少年被無神論荼毒。官方教會沒有任何消除這種屬靈劇毒的對策。在我們的首都布城，你找不到一所孩童的主日學，或一個青少年團契。基督徒的孩子們都在政府辦的仇恨學校裡長大。

看到這一切，我才真的憎恨共產主義。（它從前折磨我，那時我並不憎恨它。）

我憎恨它並非因為它對我施加的酷行。而是因為這主義荼毒十億活在它政權下的人民。它奪取了神的榮耀，掩蓋了基督的名。

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告訴我說，如今他們在自己過去的葡萄園或菜園裡挨餓——他們沒有麵包；孩子們沒有牛奶，沒有水果——因為這不再是他們的菜園，乃是集體農場了。我國的天然資源十分豐富，土地肥沃如從前的迦南地，可如今百姓卻要挨餓！

弟兄們向我承認說，共產黨的政權把他們逼為小偷和騙子。他們因為饑餓，就在自己過去的土地上（但現在屬於集體農場了）偷瓜果。然後他們只好撒謊，掩蓋自己的行為。

工人們告訴我工廠裡的暴行。勞工們被大大剝削，遠遠超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

知識份子必須違心地教導說沒有神。

占當初世界人口三分一的人民，他們整個生命和思想都被摧毀或改造了。這事現今仍然發生在受限制的國家。

少女們抱怨說，她們因為吻了一位基督徒少年，就被召去共青團訓話。然後黨方給她們另一個她們允許親嘴的人的姓名！

一切都是極其虛假和醜陋。

然後我遇到了地下教會的鬥士，就是我過去的戰友。他們有些至今尚未被捕；另一些是出監後，再度投入戰鬥的。他們呼籲我相助。我參加他們的地下聚會，他們唱的詩歌本是手抄的。

我記得偉大的聖安東尼(St. Anthony the Great)。他住沙漠三十年，遠避世界，禁食禱告，靜渡餘生。可是當他聽到聖安塔那修(St. Athanasius)與亞流(Arius)為基督的神性爭辯時，他就離開了冥想式的生活，來到亞歷山大城，幫助真理獲勝。我記得哥利瓦的聖伯那(St. Bernard de Clairvaux)。他也是住在高山的修道士。但當他聽到十字軍的愚昧，並基督徒屠殺阿拉伯人，猶太人，並與自己同信仰但不同宗派的弟兄，僅僅為要爭奪一個空墳墓時，他就從修道院下來，反對十字軍。

我就決定做基督徒所該作的：跟從基督、保羅與眾聖徒的榜樣，放棄隱退之想，重新參戰。這將是怎樣的一種戰爭呢？

在監獄的基督徒時常為敵人禱告，向他們作美好的見證。當他們得到救恩時，基督徒們就歡喜。但我憎恨邪惡的共產制度。我要堅固地下教會。靠著福音的大能，地下教會是唯一的，能夠推翻可怕的暴政的力量。

我不單想到羅馬尼亞，也想到整個共產世界。但在西方，我卻看到冷淡的反應。

當兩名共產黨作家，辛尼亞夫斯基(Siniavski)和但以理(Daniel)被他們的同志們扔下監牢時，全世界作家們都群起抗議。可是當基督徒們因著信仰被判下監時，西方世界甚至連教會都不做聲。

當古希克(Kuzyck)弟兄因為散佈“有毒的”基督徒靈修讀物與托雷(Torrey)的聖經單行本，而被逮捕入獄時，有哪個西方人理會？當普羅科菲耶夫(Prokofiev)弟兄因為分發印刷的講道被逮捕時，又有誰發聲？當蘇聯的希伯來基督徒哥倫瓦(Grunvald)，為同樣的緣故入獄，並且他

年幼的兒子被共產黨永久帶走，又有誰抗議？我曉得當我與自己的孩子米海分離時的感受。還有像哥倫瓦弟兄(Grunvald)，伊凡奈科(Ivanenko)，謝夫丘克奶奶(Granny Shevchuk)，塔伊西亞·特卡琴科(Taisya Tkachenko)，葉卡捷琳娜·維卡齊娜(Ekaterina Vekazina)，格奧爾基·維卡津(Georgi Vekazin)，還有拉脫維亞(Latvia)的彼拉特(Pilat)夫婦等等，這些二十世紀的聖徒和信心的英雄們！我的心與他們同受苦難。我低頭親吻他們的鎖鏈，就如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在他們的信徒同伴被拋給野獸吞吃之前，親吻他們的鎖鏈一樣。

一些西方教會領袖們根本不關心殉道者，更不會替他們禱告。當這些人被折磨與判刑時，蘇聯浸信會與東正教的官方領袖們（正是他們譴責和背叛了這些殉道者）正在新德里、日內瓦和其他大會上大受西方教會的歡迎。他們在那裡向每個人保證說，蘇聯人享有絕對的宗教自由。

在布爾什維克大主教尼古丁(Nikodim)發表這樣的保證時，一位普世教會聯合會的領袖就上前親吻這主教，然後他們就在普世教會聯合會的招牌下來了個大聚餐。而監牢裡的聖徒們卻在吃包心菜和沒有清洗過的腸子，正如我以前在監牢裡就是這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吃。

事情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地下教會決定如果有機會，我必須離開本國，把真相告訴西方的基督徒。

我雖然愛共產黨員，但我決定反對共產主義。我要傳福音就必須反對共產主義。

一些人叫我“傳純淨的福音！”這叫我想起，共產黨的秘密警察也曾叫我單單傳基督，不要提及共產主義。那些叫我傳純淨福音的，是否與共產黨的 secret police 同感一靈？

我不曉得所謂的純淨福音是什麼。施洗約翰傳的道理純淨嗎？他並不單單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 3 章 2 節）。他也責備希律“所行的一切惡事”（路加福音 3 章 19 節）。他不只談抽象的道理，所以最終被斬首。耶穌也不單傳講“純淨”的登山寶訓；祂也傳了許多教會領袖所謂的否定性講章：“你們這假冒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馬太福音 23 章 27, 33 節）耶穌是因為這些不純淨的講章，所以被釘十字架。法利賽人並不會被祂的登山寶訓所打擾。

我們必須稱罪為罪。共產主義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罪惡之一。每一場講道如果不否認這主義，就不是純淨的福音。地下教會否認它，不怕因此喪失自由與生命。西方世界更不該緘默。

我反對共產主義，但卻不同一般的反共人士。希特勒反共，但他自己卻是個暴君。我們憎恨罪惡，卻愛罪人。

為何我在西方也受苦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過在共產世界。

第一種苦是，我已經好久不能看到地下教會的美了。鐵幕後的信徒就如古代拉丁文的格言說：Nudisnudum Christi sequi——赤裸地跟隨赤裸的基督。

在被奴役的國家，人子與祂的百姓沒有枕頭的地方。基督徒在那裡並不為自己建築房屋。房屋有何用？你一旦被捕，你的房子就跟著充公了。你如果擁有一所新房，就更有可能被捕！因為其他人也想得到它！在這些國家，你要跟隨耶穌，不必先回去埋葬父親，也不必先與家人道別。誰是你的母親，你的弟兄姐妹？正如耶穌一樣，你的弟兄姐妹與母親便是跟從神旨意的人。在那兒，人與人的天然聯繫幾乎已經沒有了。新娘控告新郎，孩子控告父母，妻子控告丈夫等，都是常事。人際關係越來越多的只存在於靈裡的聯繫。

地下教會是一個貧窮受苦的教會，可是其中鮮有不冷不熱的基督徒。

地下教會的崇拜就如一千九百年前的初期教會。傳道人不知道深奧的神學。他們就如彼得一樣不知道神學術語。任何一個神學教授都會給彼得在五旬節的講章很低的分數。在許多國家，人們不太熟悉聖經經文，因為聖經是禁書。還有，傳道人常被監禁多年，獄中沒有聖經。當他們表達對天父的信靠時，這意義重大，因為在這種信靠的背後有著深刻動人的經歷。他們坐牢多年，每天求全能的天父給他們麵包，卻得到汙穢的包心菜。但他們依然相信神是慈愛的天父。他們就像約伯，即使神殺了他，他仍會相信神。他們也像耶穌，即使被釘在十字架上、似乎被遺棄時，仍然稱神為“父”。

凡見過地下教會之美的，就不能滿足於一些西方教會的空洞儀式。我在西方受的苦，多於在共產監牢，因為如今我親眼看見西方文明的沒落。

奧斯瓦·史班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一書裡寫道：

“你正在垂死中。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所有垂危的特徵。我可以證明，你的巨大財富和你的極度貧窮，你的資本主義和你的社會主義，你的戰爭和你的革命，你的無神論和你的悲觀主義，你的憤世嫉俗，你的不道德，你的破碎的婚姻關係，你的節育措施，這些正在從根基上侵蝕你，從頭腦上摧毀你——我可以向你證明這些都是古代眾帝國衰亡的前兆——就像亞歷山大、希臘和神經質的羅馬一樣。”

這是在1926年寫的。從那時開始，已有半個歐洲甚至古巴失去了民主和文明。許多西方國家卻還在沉睡中。

但有一股勢力卻沒有沉睡：就是共產黨。雖然在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黨對自己的主義感到失望，不再幻想；但在西方，“人本共產主義”仍然致命。西方的人文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完全不相信所有在共產國家裡發生的暴行、困苦與逼迫的報導。他們以孜孜不倦的熱情到處傳播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在上層階級的休息室，在學院的俱樂部，在大學裡，在貧民區，甚至在教會裡。我們基督徒對完備真理的追求經常是三心二意。他們對謊言卻是全心全意。

如今西方的神學家正在討論芝麻小事。這使我想到了，在1493年穆罕默德二世的軍隊圍困君士坦丁堡，巴爾幹半島未來的幾個世紀的命運，面臨著是歸向基督教，或歸向回教的關鍵時刻，圍城裡的一間教會議會卻在討論這些問題：“童貞女馬裡亞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天使是男的還是女的？如果一隻蒼蠅掉在聖水裡，是蒼蠅成聖了，還是聖水變汙了？”這可能只是當時的一個傳說。但在今天基督教教會的期刊中，你卻可以看到人們討論同樣的問題。而共產主義的威脅與地下教會的受苦卻鮮少有人提及。

人們沒完沒了地討論神學問題、儀式、並各種無關緊要的問題。

在一次娛樂聚會中，有人發問：“如果你遇到海難，只能從船上的圖書館裡抓一本書，逃到一個荒島上。你要拿什麼書？”有人回答“聖

經”，有人回答“莎士比亞”。但一位作家卻正確地回答道：“我要找一本教我如何造船及抵達岸上的書。當我脫險之後，就可以從容讀任何一本書了。”

保持一切宗派與神學的自由，重獲因廣泛的宗教迫害而失去的自由，這比堅持某些特定的神學觀點更為重要。

耶穌說，“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 8 章 32 節）。但同樣的——自由，唯有自由，才能帶來真理。而且，與其為無關緊要的事物爭辯，不如讓我們團結起來，同心為自由而戰，抵擋當今世界的暴政。

我也因分擔鐵幕國家中教會日益加重的苦難而受苦。我經歷了這苦難，如今苦難依然歷歷在目。

在 1966 年 6 月，蘇聯《消息報》(Izvestia)，和另一報紙《鄉村生活》(Dervenskais Jizn)控告蘇聯浸信會教唆會友殺死孩子，好得贖罪。他們以前也曾用這種罪名，控告猶太人。

但我曉得這意味什麼。1959 年我曾在羅馬尼亞的克羅城監獄裡，與一位名叫拉薩羅維奇(Lazarovici)的同牢。他被指控殺死了一位小女孩。我遇到他時，他不過三十歲，可他的頭髮一夜之間因為酷刑而變白，好像一個老人。他的指甲都被拔掉，為要逼他承認未曾犯的罪。一年之後，他被證實清白，得以出獄。但這時自由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永遠是一個身心都破碎的人了。

一些人讀著黨報而譏笑蘇聯出版社在共黨統治時期對浸信會的愚蠢的控訴。但對被控告的人，我曉得這意味什麼。

身處西方，但這些圖像卻不斷地出現在你的眼前，這真是太可怕了。

蘇聯卡魯加城(Kaluga)的耶摩根大主教(Yermogen)與其他七名主教如今在哪裡？他們曾抗議東正教元首亞利西(Alexei)並大主教尼可丁(Nikodim)——這兩人是共產黨手中的工具——積極配合蘇共當局的工作。如果我沒有親眼看見幾位因為抗議當局，以至死在羅馬尼亞監獄的主教，我就不會關注這些神聖的蘇聯主教。

傳道人尼古拉·埃什利曼(Nikolai Eshliman)與格列布·亞庫寧(Gleb Yakumin)因為請求宗教自由，就被由共產黨任命的教會領袖訓

誡。西方只知道這麼多。但我曾在羅馬尼亞的監牢與伊萬神甫(Father Ioan)同囚。外界只聽見這名神甫受到教會的訓誡。表面上，僅僅是訓誡而已。但在共產國家，官方教會領袖與警方密切合作。一位被教會領袖訓誡的人，也同時會得到秘密警察更有效的“訓誡”——被逮捕下牢、酷刑、毆打、強服神經藥物。

我為這些在各地受逼迫的人戰兢。我想到向他們施酷刑的人的永恆結局時，我也戰兢。當我想到西方基督徒不幫助這些受逼迫的弟兄們時，更是戰兢。

在我心深處，我深願可以流連在自己葡萄園，而不捲入如此巨大的鬥爭中。我多麼希望能置身於寧靜與安息之地。但這是不可能的。當共產黨入侵西藏時，所有與世無爭的僅僅追求純粹精神事務的和尚都被消滅。羅馬尼亞也是。教堂和修道院被解散，只留下幾間充當門面，愚弄西方人。我所渴望的那份寧靜和安息，不但與現實脫節，對我的靈魂也是危險的。

我曾經帶領這場戰爭，雖然這對我個人相當危險。他們曾在1948年在大街上綁架我，用別名把我下在牢中。那時我國外交部長安娜·包克(Ana Pauker)對瑞典的大使派翠克·馮·羅伊特斯韋爾德爵士(Sir Patrick von Reuterswaerde)說，“啊，魏恩波嗎？他目前正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散步呢。”可是這位大使口袋中卻有一封從監牢裡偷帶出來的信，就是我親手寫的。他曉得安娜在撒謊。這種事還會再次發生。如果我被殺，殺手便是共產黨的買凶。此外沒有人要殺我。如果你們聽到有關我的道德敗壞、偷盜、同性戀、婚外情、政治不可靠、或撒謊等等，便應驗了秘密警察的話：“我們可以在道德上摧毀你。”

一個非常可靠的消息告訴我說，自從六十年代末我向美國參議院作證之後，羅馬尼亞共產黨已經決定殺我。但我不能保持沉默。你們的責任便是詳細思考我說的話。就算你的結論是，我在多年監禁後，患上一種被迫害妄想症，你也該自問，這共產主義是種何等可怕的勢力，能叫它的公民患上這樣的病症？又是什麼力量促使共產黨統治下的東德居民，帶著孩子，駕駛推土機沖過柏林牆，甘願冒著全家被守衛的槍火打死的危險？

西方正在沉睡，必須被喚醒，才能看到被奴役國家的困境。

受折磨的人，為了擺脫痛苦，會尋找一個替罪羊。但我卻不能。

我不能將罪責歸咎於那些與仇視基督徒的人妥協的西方教會領袖。邪惡並非源自他們。這些領袖本身就是更古老邪惡的受害者。他們沒有製造教會中的混亂；他們不過是在教會裡發現了它。

自從我到西方，我拜訪了許多神學院。在那裡我聽到了有關教堂掛鐘的歷史；崇拜詩歌的歷史，已經廢棄了的教規，還有已經不存在的教會的處罰。我看到神學院的老師教導學員們說，創世紀的故事不是真的；亞當的故事也是虛構的；洪水和摩西的故事也不真；聖經的預言都是在事後寫的；童貞女生子是神話；耶穌復活也是神話，祂的骨頭如今還在某一個墳墓中；使徒的書信也不是真的；啟示錄不過是一個瘋人的作品。只是除此之外，聖經還是一本聖書！（如此這樣的一本“聖書”看來比中共黨報的謊言還要多！）

這便是今日西方教會領袖們在神學院學到的。這便是他們生活的氛圍。他們何必對說這些奇怪話的一個“教主”忠誠？既然教會說神死了，他們又何必對教會忠心？

這些人是官方教會的領袖，不是基督的新婦。他們是出賣基督的教會的領袖。當他們遇到一個地下教會的成員，或一個殉道者時，就如看到一個怪物。

我們不能因著人在某一方面的態度，就論斷他們。如果這樣，我們就和法利賽人一樣。他們眼中的耶穌是壞的，因為祂不遵守他們關於安息日的規定。其實，即使在他們眼中，耶穌也有令人喜愛的一面。但他們閉上他們的眼睛，完全忽視了。

於是，我們也不能不看這些教會領袖的其他長處。雖然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不正確，但在許多其他的事物上，他們有可能是正確的。他們也可能是真誠的，連他們目前的錯失，也有改正的可能。

我曾遇到一位羅馬尼亞的東正教主教。他是共產黨的傀儡，出賣自己的羊群。我握著他的手，說及浪子回頭的比喻。那時是黃昏，我們坐在他的園子裡。我說，“你看神怎樣愛一個回頭的罪人。祂也樂意接受一個主教的悔改。”我對他唱了些基督教的歌曲。這人就悔改了。

我又曾與一位東正教神甫同牢。他為了獲得釋放，就寫了好些無神論的文章。我與他談話後，他冒著永遠無法被釋放的風險，把所寫的都撕碎了。

我無法讓任何人成為替罪羊來減輕我心中的重擔。

我還有另一種痛苦。甚至我親密的朋友也誤會我。一些人說我對共產黨員充滿苦毒與憎恨，事實並非如此。

《摩西律法》的作者克勞底·蒙特菲奧裡(Claude Montefiore)說：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態度，以及祂公開譴責他們的行為，與祂要我們愛敵人並祝福咒詛我們之人的命令相違背。倫敦聖保羅神學院的退休院長馬太博士(Dr. W. R. Matthews)認為這是耶穌表現出的不連貫和矛盾之處。他給出的解釋是：耶穌不是一個知識份子！

克勞底對耶穌的印象是錯誤的。耶穌愛法利賽人，雖然祂公開反對他們。我也愛共產黨員與他們在教會中的傀儡，雖然我公開反對他們。

人們時常告訴我說：“不要提共產黨，只作屬靈的事！”

我曾遇到一位在納粹手下受苦的基督徒。他對我說，只要我為基督作見證，他就全心支持我，但我不該說任何反對共產主義的話。我問他，在希特勒掌權時，一位反對納粹德國的基督徒是不是只可以講聖經而不允許說任何反對獨裁者希特勒的話？他的回答是，“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我們當然必須反對他！”我就回答：“共產黨殺了三千萬蘇聯人，並數百萬中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們也殺猶太人。難道只有當它迫害猶太人時我們才可以反抗，而當它殺害蘇聯人和中國人時就不可以？”他的回答是：“那又另當別論。”我沒有得到任何解釋。

我曾被希特勒時代的警察毆打，也曾被共產黨的警察毆打。我看不出二者有何不同：打在身上都非常的痛。

基督教必須與各種罪惡爭戰，不單針對共產主義，我們不是只關心到這一個問題。但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巨大的敵人，也是最危險的。所以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反對它。

讓我可以再說一遍！人的最高目標是成為基督的樣式。共產黨的主要目標是阻止這個目標。他們反宗教。他們相信人死了，就變成一堆鹽和礦物質，沒有其他。他們希望整個生命都生活在物質的層面上。

他們只知道群眾。他們就像新約聖經中那個被問及名字的汗鬼。一次耶穌問那汗鬼名叫什麼；那汗鬼“回答說，我名叫群。”（馬可福音 5 章 9 節）個性——神賜予人類的偉大禮物之一——必須被壓碎。他們因為發現一個人擁有一本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人心理學》而將他監禁。秘密警察的官員沖著他咆哮道：“啊，個人——總是個人！為什麼不是集體？”

耶穌願意我們擁有獨立的人格，因此我們與共產主義不可能妥協。共產黨也知道這個。他們的雜誌《科學與宗教》(Nauka i Religia)這樣寫道：“宗教與共產主義不能並存。這兩者是彼此為敵。共產黨是對宗教的致命打擊，…是要建立一個無神的社會，叫人永遠脫離宗教的枷鎖。”

基督教能不能與共產主義共存？共產主義的答案是，“共產黨是對宗教的致命打擊”。

第五章 無敵而又廣泛傳播的地下教會

地下教會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工作。無神論是一切共產國家的國教。他們給老年人一些信仰的自由，可是青少年與兒童是絕對不允許相信基督教的。這些國家的每一種傳播媒介——電臺、電視、電影院、劇院、印刷和出版機構——都被用來消滅人們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地下教會只有非常有限的工具，去對抗巨大的獨裁政權。蘇聯地下教會的傳道人都未曾受過神學的訓練。有些中國的牧師至今也沒有機會讀到一本完整的聖經。

讓我告訴你，這些傳道人是怎樣得到按立的。我問一位年輕的蘇聯傳道，他是如何被按立的。他回答說：“我們找不到主教為我們按立。官方主教絕不會按立一個未得到黨方批准的人。於是我們十個年青的基督徒就到一個殉道主教的墳墓前。我們中間兩個人按手在墓碑上，其餘的人就在四周圍成一圈。我們請求聖靈為我們按立。我們深信我們已經被耶穌的那雙釘痕手按立了。”在我看來，這青年人在神面前的確已經被按立了！

這些被神按立，從未受過神學訓練，又只曉得很少聖經的人（就如孟加拉的傳道人），正在帶領基督的工作。

這就如初期的教會一樣，當時震動世界的那一小群門徒，曾經受過神學訓練嗎？他們個個都識字嗎？他們從哪裡收到聖經？然而，神親自向他們說話。

我們地下教會沒有富麗堂皇的大教堂。但當我們在森林中秘密聚會時，有什麼教堂比蒼天更美？在這兒，鳥啼是我們的琴聲；花香是我們的祭香；一個剛才出獄的殉道者身上穿的破衣比神甫的聖袍更令人起敬；又有天使為我們點燃聖燭，就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我永遠無法形容這個教會的美麗！有許多次，在秘密聚會之後，基督徒們就被逮捕入獄。在那裡，他們戴著鎖鏈，就像新娘戴著新郎贈送的珍貴珠寶那樣歡喜。監獄的水是靜止的，基督徒也仿佛到了可安歇的水邊，得到耶穌的親吻與擁抱。為此他們絕不肯與任何事物相交換，哪

怕是君王的位置。我只在聖經裡、在地下教會中、和在監牢內找到真正喜樂的基督徒。

地下教會受到壓迫，但她也有許多朋友，包括秘密警察的成員，甚至還有一些政府官員。有時這些暗中作信徒的就秘密地保護著地下教會。

最近蘇聯報章投訴說“外表非信徒”的人日益加增。這些人在共產黨權力機構裡工作——包括政府職位，宣傳部門，並其他部門。這些人外表是共產黨員，其實卻是地下教會的成員。

黨報說及一位少婦，在共產黨宣傳部工作。下班之後，她與丈夫就召集住在同一公寓大樓裡的其他年輕信徒，開始秘密的讀經禱告會。這樣的事現在還在世界各處發生。有成千上萬名這樣的“外表非信徒”存在。他們感到與其參加官方教會，被人監視，聽那些摻水的福音，還不如繼續保持外面的權力地位與責任，靜悄悄地、但卻十分有效地為基督作見證。

地下教會有成千上萬像這樣的忠實信徒。他們在地下室、閣樓、公寓，和田野聚會。

在共產統治的前蘇聯，沒有人記得應該是孩童洗禮還是成人洗禮的辯論、或者教皇是否無誤的辯論。他們不是“前千禧年派”或“後千禧年派”。他們不能解釋預言，也不為這些爭辯。但卻可以十分有效地向無神論者證實神的存在。

他們對無神論的回答非常簡單：“如果你到一家作客，看到滿桌的山珍海味，你會相信沒有人燒制這些食物嗎？同樣，自然界便是一個為我們準備的大餐：有番茄、桃子、蘋果、牛奶、和蜂蜜。誰為人類預備了這些東西？大自然是盲目的。你若不信神，你怎麼解釋盲目的自然界能為我們預備所需要的這一切，而且是如此的豐富多彩？”

他們也能證實永生的存在。我聽到一位信徒懇切地向一位無神論者解釋說：“假使我們能夠對一個在母腹裡的胚胎說話，當你對這胎兒說，‘胎兒期的生命不過是暫時的，過後便是一個更長久、更真實的生命。’那胎兒會怎樣回答？他大概會像你們無神論者一樣（當我們向你們提及天堂和地獄時）說：‘母腹裡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其他的都是宗教幻想。’但如果那胎兒願意靜心思想，他大概會自問：‘這兩隻胳膊

膊為何老在長？在這裡我用不著它們，也難伸展雙臂。那麼為什麼它們會長出來？是否有一個未來的世界，在那裡它們可以派上用場？還有我的腿也開始生長。在這裡非但無用，還必須把它們縮向胸前。那為什麼要長腿？也許將來的世界廣大，需要用腿到處跑動？還有我的眼睛。這裡一片黑暗，要眼睛幹嘛？會不會真的有一個光明多彩的世界在等著我？’

“如果這胎兒對自己本身的發育情形加以思考，那麼雖然現在沒有看見，他已經可以領會到母腹外面還有一個世界存在著。我們也一樣。當我們年輕時，精力十足，心智卻不夠成熟，不知如何恰當運用它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在知識和智慧上也成長，但靈車已在等著送我們入土了。為什麼我們的知識和智慧增長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卻用不著呢？為什麼一個胎兒會長手臂、腿和眼睛？原來，這是為了之後的生命。所以現在也是如此。我們在經驗、知識和智慧上的成長是為了隨後而來的服事。我們正在為死亡之後的更高層次的事奉做準備。”

至於耶穌，共產黨的出版社說，歷史上根本不存在耶穌其人。地下教會的反駁也簡單：“你口袋裡是什麼報紙，是昨天的還是今天的黨報？讓我看。啊，是1964年1月4日的黨報。這1964年是從何時算起？你們說耶穌從不存在，可是你們的黨報為何從祂出生的年份算起？在祂來以前已經有時間了，可是人類卻把祂出現的日子當作是時間的分水嶺。好像祂來之前的日子盡都虛空；祂來以後人類才曉得生命的意義？你們的黨報自己證明耶穌的存在不是幻想。”

西方教會的牧師常以為自己教會的成員都信服基督教的真理。其實不然。你鮮少在西方的教堂聽到證實我們信仰真理的講章。但在鐵幕國家，未讀過神學的信徒卻能給初信的門徒非常紮實的信仰根基。

地下教會是基督教的信仰堡壘，但她與官方教會相互交織，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在被奴役的國家裡，一些官方教會的牧師在政府施加的限制之外，秘密地在地下教會開展著平行的事工。

與共產黨妥協的官方教會，由來已久。它起源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一位名叫色基司(Sergius)的神甫所興起的一個所謂的“生命教會”。他的一個合作者宣告說：“馬克思主義是用無神論者的文字寫的福音”。多麼優美的神學啊。

每一個國家都有許多像色基司一樣貨色的人。

在匈牙利，天主教的巴羅神甫(Balogh)聯合一些新教牧師，一同幫助共產黨控制全國。

在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甫布都西亞(Burducea)幫助共產黨掌權。他曾是法西斯反共分子。如今為了向共產黨表示痛改前非，就比紅色共產黨更“紅”。當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Vishinski)在我國宣佈羅馬尼亞成為共產國時，這位神甫就站在那位蘇聯人的身邊，面露嘉許的微笑，說：“這新政府要建立一個地上的樂園。從此以後，你們不再需要天上的樂園了”。

至於蘇聯的尼古拉(Nikolai)大主教，有記錄顯示他是政府的一名線人。投奔西方的蘇聯秘密警察德里亞賓少校(Deriabin)證實尼古拉是他們的暗探。

幾乎所有的宗派都面對同樣的光景。目前羅馬尼亞浸信會的領導層是黨方強加的，它揭發真信徒。在蘇聯，浸信會的領導層也是如此。羅馬尼亞安息日會的主席達奇西(Tachici)告訴我說，自從共產黨在國中掌權的第一日起，他就已經是秘密警察的線人了。

共產黨雖然已經關閉了成千上萬所教堂，但並沒有關閉全部，他們特意留下一些象徵性的官方教會，作為視窗，觀察、控制、並最終消滅基督徒和基督教。他們保留教堂的建築，作為共黨的工具，控制基督徒，矇騙外國遊客。這種情形如今仍然存在於中國的官方教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TSPM，也稱“三自教會”）。這“唯一合法”的中國教會代表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中國基督徒。

在羅馬尼亞，我也曾經獲得建議，成為這種特意保留之教會的牧師，條件是向秘密警察報告會友的情形。西方人習慣于“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要麼全部這樣，要麼全部那樣——無法理解這一點。但是地下教會永遠不會接受那些表面的、受控制的教會作為替代品。地下教會知道自己的任務，是有意義和有效的向包括青少年在內的“每一個受造者”傳福音。

但在官方教會，雖然有許多奸詐的領袖出賣羊群，信徒卻依然有真實屬靈的生活。（西方的教會也有類似的光景。領袖雖然敗壞了，信徒卻依然忠於基督。）

在蘇聯，雖然講臺的信息清一色地諂媚共產黨，東正教的儀文依舊不變，餵養著教會成員的心靈。信義會，長老會和其他新教教派也繼續使用古老的讚美詩。還有，連告密者（包括許多官方牧師）的講道也必須包含一些聖經章節。當今中國也有人因聽到這些叛徒的講章而悔改。他們知道這些講員是叛徒，會向秘密警察彙報他們的悔改。他們必須向那個用敗壞的講道帶領他們信主的人隱藏自己的信仰。這便是神在利未記 11 章 37 節裡用象徵性語言描述的偉大奇跡：“若是死的，有一點掉在要種的子粒上（按照摩西律法，這是不潔的），子粒仍是潔淨。”

說句公道話，並不是全部官方教會的領袖，包括最高層的領袖，都是共產黨的人。

也有一些地下教會的成員在官方教會裡佔有重要地位，雖然也有一些必須隱藏自己。這些成員嘗試維持純正的基督教，不叫它淪為一個儀式，卻是可以奮鬥的信仰。當秘密警察前來關閉羅馬尼亞的弗拉底米若斯提修道院 (Vladimireshti)，以及蘇聯本國的許多修道院時，他們發現阻力很大。一些共產黨員因為企圖禁止傳播宗教信仰，甚至賠上了他們的性命。

但官方教會的數量是越來越少了，我想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蘇聯不會超過五、六千所。（美國人口與蘇聯人口相近，在當時卻擁有三十萬所教堂。）還有，這些蘇聯的“教堂”，並不如我們的想像。有好些不過是一間小房子。外國人看到莫斯科的大教堂充滿人群，就以為這裡宗教非常自由。他們欣喜地報導說，“甚至教堂都坐得滿滿的！”他們沒想到，全城七百萬靈魂卻只有這一所新教教堂是何等的可悲！還有，那些只有一個小房間的教堂，許多在偏遠的地方，不是蘇聯百分之八十的民眾所能抵達的。我們只有兩種選擇：或遺忘這些民眾，或使用非法的管道向他們傳福音。此外別無選擇。

共產主義在一國越是得勢，教會就越需要轉到地下。

如今，共產黨就用關閉的教堂來進行反宗教的集會。

地下教會如何“吸收”無神刊物為己所用

但地下教會也曉得如何利用無神刊物作為屬靈糧食，加以利用；就如先知以利亞從不潔淨的烏鴉得餅和肉為食物一樣。

無神論者們大費心機抨擊聖經。他們出版了一本書，名叫《可笑的聖經》；另一本書，稱為《信徒與非信徒的聖經》。為了譏笑聖經，他們就引用許多聖經章節。我們多麼高興！這數百萬冊的書佈滿了聖經章節，雖然共產黨嘲笑這些經節，但它們卻是不可言喻的美麗。對它們的批判是如此的愚昧以至無人理會。在過去，天主教的異教裁判所把一些真聖徒視為“異教徒”，迫使他們身穿畫著地獄的火與魔鬼的各種怪衣，遊街示眾。但這些“異教徒”是何等神聖！如今也相仿。聖經仍然保持它的真實，即便是魔鬼引用它們。

共產黨印刷局非常高興又獲得數千封的信件，要求重印這些引用聖經章節的無神論書籍。他們不曉得這些信件來自地下教會，這是地下教會獲得經文的唯一途徑。

我們也曉得如何善用無神論的聚會。

一位共產黨教授在一個聚會裡，當場示範耶穌不過是一個魔術師而已。教授在臺上擺著一瓶水。他把一些粉末加在水中，水就變紅。教授解釋說：“這就是所謂的神跡——耶穌在祂的長袖裡藏著粉末，就弄出一個水變酒的神跡。但我比耶穌更厲害。我能把酒再變回水。”於是他加入另一種粉末，紅色的水又變透明了。然後他再加一種粉末，水就又變成紅色。

一位基督徒站起來說：“教授同志，你變戲法的能力讓我們感到驚訝。我們只有一個要求：喝一瓶你變的酒！”那教授回答道：“這個我做不到。這粉末有毒。”那位基督徒就說：“這便是你與耶穌完全不同的地方。耶穌的酒，給我們喜樂了兩千年。而你的酒，卻足以毒殺我們。”這位基督徒因此下牢。但這事件卻大大廣傳，堅固了許多人的信心。

我們雖軟弱像年少的大衛，卻強壯勝過無神巨人歌利亞，因為神在我們一方，真理屬於我們。

有一次，一位共產黨員在一所工廠發表無神論的演講。每一位員工都必須出席，包括基督徒員工。所有人都必須靜聽反對神的言論，並信耶穌的愚笨。他說沒有靈界、沒有神、沒有基督、沒有來世，人不過是物質而已，沒有靈魂。他一再強調只有物質存在，說了又說。

一位基督徒起立，要求發言。得到批准後，這基督徒就提起他坐的座椅，把它摔到地上。他停頓了一會兒，看著那張椅子。然後上臺朝那位講員臉上煽了一巴掌。那講員非常生氣，滿臉通紅，滿嘴髒話，高聲呼叫共產黨員同志們上來逮捕這基督徒。他責問道：“你膽敢動手打我？有什麼理由？”

基督徒回答道：“你剛剛證明了自己是在撒謊。你說一切都是物質，此外無它。我把椅子摔在地上，它果然是物質，它不會生氣，因它確確實實就是物質。可是我打你，你的反應卻不像椅子。物質不會生氣，你卻會。所以說，教授同志，你錯了。人不單是物質。我們也是靈體！”

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在無數這樣的場合裡，戳穿了無神論者的詭辯。

在監牢，一位政治官員粗暴地問我說：“你要堅持愚笨的宗教到幾時？”我就對他說：“我曾見過好多位無神論者在臨死前懊悔自己不信神；他們呼求基督。但你可以想像一個基督徒在臨死之前，懊悔自己成為基督徒，於是開始呼喚馬克思或列寧來救他脫離他的信仰嗎？”他開始大笑——“好聰明的回答。”我繼續說：“當一個工程師建成了一座大橋，一隻小貓跑過去並不證明橋身穩固。必須有一列火車行過才能證明。在凡事順利時，你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並不證實無神論。當危機來臨時，無神論就站立不住。”於是我引用列寧的書，向他證實列寧甚至在成為蘇聯首相後，當事不順利時，也會急得做起禱告來。

我們心中安寧，也能安靜等候事情的發展。只有共產黨不能安寧，拼命發動新的反對宗教的運動。他們證實了聖奧古斯丁的話說，“一顆心除非找到你（基督），不然總不得安息。”

為什麼連共產黨員也能得救

地下教會若得到自由世界基督徒的幫助，就能贏得共產黨員的心，從而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能贏得共產黨員，因為共產主義是反人性的。狗不肯放棄口中銜著的骨頭，因為這是它的天性。共產黨員明知他們所相信的是荒謬的，仍然被迫相信，所以他們的內心深處反抗他們外表所必須扮演的角色。

當一位共產黨員強調物質就是一切，人不過是一堆化學物質，我們死後就變回鹽和礦物質時，我們只要問，“為什麼各國共產黨員願意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化學物質有理想嗎？礦物質會不會為了別人的好處，就自我犧牲？”他們無言以對。

還有關於殘暴！人的受造，不是為了成為暴君或殺手。人不能長久殘暴。就如納粹政權垮臺後，納粹領袖有些人自殺，另一些則悔改，承認他們犯了大罪。

在共產國家有極多的人醉酒。這暴露了人們渴望擁有一個更有意義的生命，這不是共產主義所能提供的。蘇聯人的胸懷豁達深沉；共產主義則過於膚淺。蘇聯人尋求深層的生命，既找不著，就沉溺於酒海。酗酒是對生活的殘酷和欺騙感到恐懼的表現。但酒精只能給人短暫的解脫，而真理——如果被知曉——將給人帶來永遠的自由。

當蘇軍佔領我國期間（1947-1989），有一天，一種不可名喻的力量催動我，叫我走進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酒館。我帶著太太一同進去。進到裡面，我們就看到一位蘇聯軍官手持手槍，威脅眾人；他要添酒，酒店卻不給，因為他已經醉了。人人都很害怕。我去見店老闆——他認識我——請他給這上尉加酒。我向他保證我會陪同這軍官，確保他不鬧事。酒就一瓶瓶地送上桌。桌上有三隻酒杯，上尉每次總是禮貌地盛滿三杯，然後把三杯酒都喝盡。我與太太都沒有喝。這上尉雖然已經大醉，腦筋卻還會思想，因他是一個習慣喝酒的人。我對他說基督，沒想到他竟然非常細心地聽。

最後他對我說：“既然你告訴我你是誰，現在讓我也告訴你我是誰：我曾是一名東正教的神父。當史達林開始大逼迫時，我最先放棄信仰。我到各鄉鎮演講，說，沒有神。我向眾人承認說，‘我過去當神甫

是欺騙你們。其他的神父們也是如此。’我的熱心大得黨的青睞，於是我搖身一變成了秘密警察的軍官。神給我的處罰就是，我必須用我的這雙手，酷刑甚至殺死基督徒。如今我喝酒，不斷地喝，要忘卻我所作的，可是卻忘不了。”

許多共產黨員自殺了。他們最偉大的詩人葉賽寧(Essenin)和馬雅可夫斯基(Maikovski)自殺了。他們的大作家法捷耶夫(Fadeev)也是。法捷耶夫剛寫完他的小說《幸福》就自盡了。這小說解釋說，幸福便是無止境地為共產主義奮鬥。法捷耶夫是那麼地幸福，以至在寫成了這部小說之後，竟吞槍自盡了——看來他的靈魂都難以承擔他自己編撰的這麼大的謊言。還有在沙皇時代有名的共產主義鬥士，約菲(Joffe)和多馬金(Tomkin)，在看到共產主義的真相後，都接受不了而自殺了。

共產黨員不快樂。連他們的獨裁者也不快樂。史達林多麼不快樂！在幾乎殺盡了所有的老同志後，他常常害怕被人下毒，又怕自己會自殺。他有八間睡房，每一間都可以穩固地上鎖，就像銀行的保險箱一樣堅固。沒有人曉得在某一個晚上他會睡在哪一間睡房。他的食物必須由廚師在他面前嘗過，然後他才敢吃。共產主義無法使任何人快樂，包括它的獨裁者。共產黨員需要基督。

如果我們使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悔改信了主，就不但釋放了被他們壓迫的人民，也釋放了他們自己。

地下教會代表著被奴役國家中被奴役人民的最深需求。幫助她！

地下教會的特徵是在她對信仰的真誠。

一位化名為喬治的牧者在他的一本論及地下教會的書中寫道：

一位蘇聯陸軍上尉來到匈牙利的一位牧師家，要求單獨會面。這上尉非常傲慢，也很在意自己作為戰勝者的角色。他被引進一間小會客室，等門關上之後，他指著牆壁上掛著的十字架。

“你曉得那東西是假的，”他對牧師說。“這不過是騙局，是你們神職人員為了騙窮人，讓他們被富人剝削！現在我們單獨會面，你只須向我承認說，你從來沒有真正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那位牧師微笑說，“但是，我可憐的年輕人，我真的相信。這是真的。”

“我不要你向我玩這一套！”上尉喊道。“我是當真的。不許你嘲笑我！”

說罷，他拔出左輪手槍，瞄準牧師。“除非你向我承認這是一個謊言，不然我就開槍！”

“我不能承認這一點，因為這不是真的。我們的主確確實實是神的兒子。”牧師回答。

這上尉就把左輪手槍丟在地上，抱著這位神的僕人，雙眼流著淚花。

“這是真的！”他喊道。“這是真的。我早就相信。只是我不能肯定有人會為這信仰而死，除非我親自看到。哦，多謝你！你堅固了我的信心。如今我也可以為基督死了。你已經向我展示了如何為祂而死。”

我也知道其他類似的例子。當蘇聯人佔領羅馬尼亞時，兩名全副武裝的蘇聯士兵持槍進入一所教堂，說：“我們不信你們的宗教。凡不馬上放棄信仰的就要被槍斃！放棄信仰的可以站在右邊！”一些人就站到了右邊，然後被令離開教會回家去。當這些人拔腳逃走後，士兵們激動地擁抱剩下的基督徒說：“我們也是基督徒，但我們只希望與願意為真理而死的信徒有交通。”

這些不怕死的基督徒至今仍在東南亞的共產國家為福音而戰。他們不單為福音而戰，也為自由而戰。

許多西方基督徒在家裡常會花很多時間聽屬世的音樂。我們羅馬尼亞的信徒家裡，有時也會聽到大聲的音樂，但這是為了掩蓋地下教會傳福音的事工，免得被鄰舍們聽到而去報告秘密警察。

地下教會偶爾遇到一位從西方來的真基督徒時，會感到多麼的歡喜！

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但我卻是那些無聲之人的聲音；他們被蒙住了嘴巴，在西方從來沒有人替他們發聲。以他們的名義，我請求你們在信仰上不可馬虎，在處理基督教問題時要嚴肅認真。我代表他們，懇求你們以禱告並實際行動幫助這些在共產國家和其他被奴役國家裡忠心為主受苦的地下教會。

我們肯定能贏得共產黨員。首先是，神在我們的一方。其次是，我們的信息正是人心最深處的需求。

當納粹時代，我曾經與一些共產黨員同監。他們向我承認說，當他們遇到危難時，他們也禱告。我甚至看到共產官員在臨死時，口中喊道：“耶穌，耶穌！”

我們必然得勝，因為我國人民的一切文化傳統都站在我們的一方。蘇聯人可以禁止一切現代基督徒的文章言論。可是他們卻不能銷毀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的書。人們從這些書中發現基督的光。同樣的，東德有歌德(Goethe)；波蘭有辛凱維奇(Sienkiewicz)等等。羅馬尼亞的最偉大的作家首推薩多維努(Sadoveanu)。共產黨把他的著作《聖徒的生活》改名為《聖徒的傳說》出版。但就是在這標題下，聖徒的榜樣依然激發人心。

他們也不能排除拉斐爾(Raphael)，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等人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都說及基督。這些名家的仿製品也廣受民眾的歡迎。

當我對一位共產黨員談及基督時，他內心最深處的屬靈需求便是我的盟友，我的幫手。他的最大難處不是如何反駁我的論點，而是他難以壓制自己良心的聲音，因為他的良心完全站在我這邊。

我認識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教授，他們在上無神論的課之前，竟然禱告求神幫助他們上課成功！我也曉得一些共產黨員參加一些偏遠的地下基督徒聚會。被黨方發現後，他們就極力否認參加過地下教會的聚會。過後他們就痛哭，懊悔自己沒有勇氣為信仰站立。他們也是人。

當一個人得到信仰時，就算是非常原始的信心，也會發展和成長。我們肯定它會得勝——地下教會多次看到它勝了又勝。

基督愛共產黨員和其他“信仰的敵人”。我們必須也必會贏得他們。凡希望滿足基督心願，得著所有人之靈魂的，就必須支援地下教會和她的工作。耶穌說：“教導萬民。”祂從來沒有說我們應該先得到政府的允許才可以傳福音。為了對神忠心，和不辜負神託付給我們的大使命，我們必須超越國界，把福音傳給鐵幕國家的人。

通過與當地地下教會的合作，我們就能夠把福音傳給他們。

地下教會的組成部分

地下教會有三種成員：

第一種：是被共產黨開除的前牧師傳道。他們是數以千計不在福音上妥協的牧師和傳道人。他們許多人為信仰被逮捕下牢，受盡折磨。但一出監獄就馬上恢復他們的事工，秘密又有效地在地下教會服侍。雖然共產黨已經關閉他們的教堂，或另選“更可靠”的牧師取代他們。但這些前牧者們卻比以前更有效地服侍教會，就是在暗中服侍。他們在穀倉、閣樓、地下室、夜間的乾草場，或任何信徒可以秘密聚會的場所聚會。他們是活著的殉道者，冒著重新被捕和更多折磨的危險，絕不停止他們的侍奉。

第二種：是地下教會的龐大的具有獻身精神的平信徒大軍。中國佔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共產中國成千上萬的平信徒“未經允許”就傳福音。逼迫總是產生更好的基督徒，就是見證基督，贏取靈魂的基督徒。共產黨的逼迫產生的嚴肅獻身的基督徒，是自由世界少有見過的。這些人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成為基督徒卻不想贏得他們遇見的每一個靈魂。

《紅星報》（蘇聯陸軍軍報）攻擊蘇聯基督徒說：“基督的崇拜者們貪得無厭，試圖勾引每一個人。”但這些基督徒的光輝生活，贏得鄰裡和村民的尊敬與愛戴。在任何鄉鎮，基督徒總是最受喜歡和愛戴的居民。當一位母親生病，不能照顧孩子時，基督徒裡做母親的就會過來替她看顧孩子。當一個男人生病不能砍柴時，就有一位主內的弟兄來幫助他。他們活出了他們的信仰。於是當他們為基督做見證時，人們就樂意傾聽而且願意相信，因為在他們的生命中看到了基督。由於只有官方執照的牧師可以上臺講道，於是數以萬計的熱忱、獻身的基督徒就在共產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贏得靈魂。他們在市場裡、鄉村水泵旁等，每一個有人路過的地方見證基督與傳講福音。共產黨的報章承認說，基督徒肉販把福音單張夾在包肉的紙張裡（傳福音）。共產黨的新聞又說，在共產黨印刷局當高級職員的基督徒，深夜潛回，開機印刷數以千計的基督徒讀

物，在天亮之前就關機離去。黨報又承認莫斯科的基督徒孩子們從“某些地方”獲得福音書，用手抄寫。然後這些孩子們就把這些抄本放進掛在學校的更衣室裡的老師的外衣口袋中。這些廣大的平信徒是非常強大又有效的宣教力量，他們遍佈每個共產主義國家。

這數百萬真實、獻身，火熱的平信徒，已經被逼迫他們的烈火煉淨，這火原是共產黨希望用來摧毀他們的。

在共產主義的古巴，官方的普世教會委員會主要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教會領袖組成。然而，儘管政府不斷騷擾，成千上萬的家庭教會還是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

第三種：是大批忠心的、在官方的、但被束縛和噤聲的“教會”任職的官方牧師。地下教會並非全然與官方教會脫節。在許多共產國家，諸如波蘭、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好些官方教會的牧師們也同時秘密地在地下教會工作。當今在有些國家這兩種教會仍相互交織存在。這些牧師們只准在他們狹小的官方教堂裡傳講基督，離了教堂就不行。他們也不准開設兒童或青年聚會。非基督徒也不敢來。他們不許拜訪生病的會友，為他們禱告。共產黨制定了一大堆規條來束縛他們，以至他們的“教會”完全失去功用。

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宗教自由”。許多時候這些牧者們冒著失去自由的風險，勇敢地，平行地進行遠遠超出政府限制的秘密事工。他們秘密服侍青少年與兒童。在中東、北非，和亞洲，他們秘密在信徒的家裡，並地下室裡傳道。他們又秘密接受與分發基督教的讀物給饑渴的靈魂。他們冒著失去自由的危險，故意秘密地忽略官方限制，服侍身邊饑渴的靈魂。他們外表溫順，服從共產黨，暗地裡卻冒死秘密傳揚神的話。前蘇聯當局發現並逮捕了不少這樣的牧師，把他們囚禁數年。

當今有越來越多的男女被抓捕。他們是受限制國家地下教會的重要部分。

總而言之，前牧者（他們被自己的教會趕出和被官方政府逼迫），教會平信徒，並一些官方教會的牧師（他們秘密地進行比他們所允許的更大更廣泛的事工）——這三種成員便組成地下或“非官方”教會。這地下教會將會繼續活動，直到共產主義或其他“主義”倒臺。在一些地

區，某一種成員比其他的成員更活躍，但這三種成員都存在，也都冒著極大的危險為基督工作。

西方有一位對宗教問題很感興趣的人，常常到諸共產國家旅遊。他回到西方時寫道，他在共產國家從未遇到過什麼地下教會。

這就如一位旅客，拜訪了中非未開化的土人部落之後，回來說，“我深入詢問了許多當地人，問他們是否說散文。他們都告訴我他們不說。”事實是，當地土人都說散文，只是他們不知道他們說的就是散文，因為他們不懂得“說散文”是什麼意思。

西元最初幾十年的基督徒並不知道自己是（被後來人稱為的）基督徒。如果你問他們的宗教，他們會回答說，他們是猶太人/以色列人/信耶穌為彌賽亞的人/弟兄/聖徒/神的孩子等。“基督徒”這名字是後來別人對他們的稱呼，是從安提阿城開始的。

馬丁路德的信徒並不曉得自己便是路德會員（信義會員）。路德本人強烈抗議使用這個名字。（只有中文的路德會改名為信義會；英文依然使用路德會。）

“地下教會”是一個由共產黨人以及那些研究東方國家宗教動態的西方學者所賦予的名稱，指的是一個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自發形成的秘密組織。地下教會的成員並不以這個名字稱呼他們的組織。他們稱自己為基督徒/信徒/神的兒女。但他們從事地下工作，秘密聚會，通過隱秘的聚會傳播福音。有些西方國家來的人參加了這些聚會後，還不知道這就是地下教會。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名稱，既由對手賦予，也由那些從外部充滿愛意地看待這個美好秘密組織的人賦予。

你可以在西方世界旅行多年，卻依然未曾遇到一個國際間諜網。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間諜網不存在。沒有一個間諜網會那麼笨，以至會暴露給一個好奇的旅客。

在下一章我將引用幾十年前蘇聯媒體刊登的一些文章，來證明這個勇敢的地下教會不但存在，而且其地位越來越重要。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戰勝共產主義

我已經提及我們如何在蘇聯軍隊，並在共產黨統治的羅馬尼亞，秘密傳福音。我也已經呼籲你們，支持我們向共產黨員和被他們壓迫之下的人民傳講耶穌。我的挑戰是“有遠見”還是“不可行”？是否現實？

如今在共產亞洲與其他被奴役國，是否還有地下教會？那兒的地下工作是否還行得通？

對這些問題，我們有非常好的新聞剪貼，作為回答。

如今共產黨正在慶祝超過半個世紀的共產統治。但他們的勝利其實是失敗。得勝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共產主義。我們地下教會仔細研究蘇聯的報紙，裡面充滿了針對地下教會的負面宣傳。蘇聯的地下教會那麼強大，以至敢於半公開地工作，這著實令共產黨喪膽。現在活著的前蘇聯領導人也證實了這些黨報的報導。

我們必須記得，世界各地的地下教會就像冰山，大部分是藏在底下看不到的，只有一小部分公開運作。

下面就是我對他們在二十世紀所取得的一些輝煌成就所做的簡要彙編。

冰山一角

1966年11月7日，高加索的蘇湖米城(Suhumi)的地下教會舉辦一個大型露天聚會。許多其他城市的基督徒也來參加。在講壇呼召時，有四十七名青少年接受基督。他們馬上就在黑海受洗，一如聖經中使徒時代的做法。（他們沒有時間進行受洗的訓導課程。）

經過幾十年的共產黨專制，沒有聖經、基督教書籍，和神學院，地下教會的牧者們無法接受神學訓練。但耶穌的門徒腓利也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當一位和他談道大約只有一小時的太監問他說，“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洗有什麼妨礙呢？”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們兩人“就同下水裡去，腓利就給他受洗。”（使徒行傳8章36-38節）

黑海的水非常充足，地下教會就恢復使徒時代的做法。如今，雖然共產黨已不在蘇聯掌權，但基督徒在前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些地區還是面臨著逼迫。

《蘇聯教師雜誌》(Uchitelskaia Gazeta)在1966年8月23日報導，說在頓河河畔的羅斯托夫城(Rostov-on-Don)，浸信會信徒進行街頭示威，拒絕註冊他們的教會，也不聽從被共黨委任的所謂的“教會領袖們”。

示威的日子選在5月1日，勞動節。就如耶穌常常選擇在安息日行神跡，違抗法利賽人；地下教會有時也會選擇在共產黨的大日子示威，違抗共產黨的法律。5月1日是共產黨的大日子，年年都要大事慶祝，每個人都被強迫參加。但這次，蘇聯第二大勢力——地下教會——也在街頭出現。

有一千五百名信徒出席。他們曉得自己正在冒著喪失自由的危險。他們也知道監牢的饑餓與酷刑在等著他們。但神的愛催促他們前來。

每個蘇聯信徒都曉得巴那勿(Barnaul)福音派基督徒出版的《秘密宣言》，其中提及庫倫達(Kulunda)村莊的馬拉姐妹(Hmara)被告知她的丈夫死在牢中。她成了寡婦，帶著四個幼小的孩子。當她得到丈夫的屍體時，她看到丈夫手腕上有手銬銬過的痕跡；雙手、十指、並腳板都嚴重燒傷；下腹刀疤累累；右腳腫脹；雙腳都有被打的痕跡。總之，全身上下都佈滿了被毒打的痕跡。

每一個參與羅斯托夫公開示威的信徒，都曉得自己可能會遭遇同樣的虐待，可是依然出席。

他們也知道馬拉的丈夫才信主三個月，就為主舍了命。他下葬時有一大群信徒送殯，悼詞寫著：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利比書1章21節）。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馬太福音10章28節）。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被殺之人的靈魂”（啟示錄6章9節）。

這殉道者的榜樣激勵了羅斯托夫的眾人。他們圍在一所小屋子四周。街上到處都是人——有些在附近的屋頂上，有些在樹上——不禁讓

人想到聖經裡的矮子稅吏撒該。那天有八十人悔改信主，多數是年青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前共青團的團員！

此後信徒們步行，穿過市區，前往頓河為這些初信的人受洗。

不久共產黨警察的幾輛卡車就抵達河邊。他們要逮捕帶領的弟兄（因為他們不可能逮捕 1500 人！）信徒們馬上跪下懇切禱告，求神保護祂的子民，使他們能夠進行當日的聚會。然後弟兄姐妹們就肩並肩站成人牆，圍住帶領的弟兄，希望可以阻止警察逮捕他們。情況變得非常緊急。

《蘇聯教師雜誌》說這些羅斯托夫的“非法”浸信會（在蘇聯，“浸信會”一詞包括五旬節派和福音派）會員擁有地下印刷機用來印刷非法刊物。這些刊物呼籲青少年為信仰站立，也建議基督徒父母做一件我認為非常好的事情：“帶他們的孩子參加葬禮，使他們明白人生轉瞬即逝，所以不要過於擔心。”又建議父母給孩子們基督教教育，以對抗他們在學校受到的無神論毒害。

這《蘇聯教師雜誌》在文章結尾問道：“為什麼我們的老師們那麼膽小，不敢介入學生們的家庭生活，以至於他們被宗教愚弄？”

這份《蘇聯教師雜誌》也描述了對那些秘密施洗的地下工作者的審判過程：“被傳喚作證的年輕信徒們在共產主義法庭上表現得目中無人且不屈不撓。他們表現得憤怒而又狂熱。年輕女性旁聽者以仰慕的眼神注視著被告，同時以不滿的目光看著無神論的公眾。”

地下教會成員冒著被毆打和監禁的危險，在蘇聯共產黨總部的門前請願，要求更多的自由。

我們有一個通過秘密管道運送到西方的材料，它來自蘇聯福音派浸信會教會的“非法”委員會（該委員會與由叛徒卡列夫 Karev 領導的、受共產黨控制的“浸信會聯盟”相對；卡列夫曾歌頌共產黨對基督徒的大屠殺，渲染蘇聯政權下的“自由”。）

這份秘密材料提到了另一場英勇的公共示威，這次是在莫斯科。

這裡是這份宣言的翻譯：

緊急通知

親愛的弟兄姐妹，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與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們必須急迫地告訴你們，有五百名來自各地的福音派浸信會代表在 1966 年 5 月 16 日抵達莫斯科。我們到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廈，要求與中央權力機關對話。

我們交上一份請求，要求會見總書記勃列日涅夫。

這宣言又說，這五百名弟兄們整天站在大廈外。這是莫斯科首次出現的公開反共示威。他們都是地下教會的代表。天將晚時，他們交上第二份請願書給勃列日涅夫，投訴一位共產黨官員斯特羅加諾夫“同志”(Stroganov)拒絕傳達他們的要求給總書記，並且威脅他們。

儘管那晚下雨，這五百名代表仍然整夜留在街頭。儘管遭到言語侮辱，並被路過的汽車濺上泥漿，他們仍然堅持站在共產黨大樓前，直到天亮！

第二天，黨方建議這五百名弟兄們進入大廈，會見一些低級官員，但“信徒們知道，如果他們進入大廈，由於大廈裡沒有證人，就必被打。於是弟兄們拒絕進入，堅持要見勃列日涅夫。”

於是不可避免的事便發生了。

在下午 1 點 45 分，二十八輛軍車開到，黨方開始以暴力對付這些信徒。“我們手牽手圍成一圈，組成人牆，開始唱詩歌，《我們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就是可以背負十字架的日子》。秘密警察的人員開始毆打我們，不分老少。他們拉斷我們的人牆，毆打我們的臉和頭，又把我们拋到柏油馬路上。他們拉著弟兄們的頭髮，拖他們上車。凡嘗試離開的，就被打到喪失知覺。後來信徒們全部被拖上車，不知被載到何處。這些弟兄姐妹們在秘密警察的軍車裡還唱著詩歌。這一切都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

這事以後，一件更美的事就發生了。在那五百名信徒被捕受刑後，基督羊群的真領袖喬治·文斯(G. Vins)和霍列夫(Horev)，竟然還敢跑到同一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部去交涉。正如耶穌在施洗約翰被捕後，就開始在同一個地方傳同樣的信息，就是約翰為之受苦的信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 4 章 17 節）。

文斯與霍列夫要求知道被捕代表們的下落，並要求立刻釋放這些代表。這兩位勇敢的弟兄隨即失蹤，下落不明。後來聽說他們被關在列福爾托沃監獄(Lefortovskaia)。

地下教會基督徒害怕了嗎？不！其他的弟兄們馬上冒著失去自由的危險，印刷以上的宣言，告知事情的經過。他們勸勉信徒們：“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腓利比書 1 章 29 節）。他們堅固弟兄們：“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3 章 3 節）。他們又引用希伯來書 12 章 2 節，呼籲弟兄們定睛于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地下教會公開反對無神論對青少年的毒害，不單在羅斯托夫與莫斯科，也在全蘇聯。他們反抗共產主義的毒化政策和官方教會中那些陰險的領導人，他們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寫道：“在我們的時代，撒旦發號施令，而‘教會’接受所有與神誠命相悖的決定。”

《東方真理報》(Pravda Vostoka)報導了對阿列克謝·涅韋羅夫(Alexei Neverov)、伯裡斯·加爾馬紹夫(Boris Garmashov)和阿克森·祖博夫(Axen Zubov)弟兄的審判。這些弟兄們安排大家聆聽美國的福音廣播。他們把福音信息錄製下來，然後分發給眾人。

他們又被指控假借“郊遊”和“藝術圈”的名義，進行秘密的福音聚會。地下教會的工作，宛如初期教會在羅馬的地下墓穴(catacombs)聚會一樣。

1966 年 9 月 15 日的黨報《蘇維埃莫爾達瓦》(Sovietskaia Moldavia)也提到，地下教會油印小冊子，並違法地在各個公開場所聚集，到處見證基督。

該報又說，有三名少男和四名少女，在雷尼(Reni)前往基希涅夫(Chisinau)的火車上唱基督徒聖詩“將我們的青春奉獻給基督”。該文章記者承認自己感到反胃，因為這些信徒“在街上，在車站，在火車與公車上，甚至在政府機關裡，到處傳福音”。這又是今日蘇聯地下教會活動的一個證據。

當這幾位基督徒因唱基督教聖詩而在法庭上被定罪時，他們跪下說：“主阿，我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裡。我們感謝你，允許我們為這信

仰受苦。”一位“狂熱的”馬丹(Madan)就帶領在法院裡的觀眾一同唱詩，所唱的詩正是這些剛剛被判入獄和酷刑的兄弟姐妹們所唱的。

在五月一日，科普塞格(Copceag)與紮哈羅夫卡(Zaharovka)村莊的基督徒，由於沒有教堂，就在森林裡秘密敬拜聚會。他們又假借生日慶祝，進行聚會。(許多基督徒家庭，雖然只有四，五名家庭成員，一年卻有三十五次“生日慶祝會”用於掩蓋秘密的敬拜聚會。)

沒有任何監獄或酷刑可以嚇唬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就如初期教會的基督徒，逼迫反而加深他們的奉獻精神。

1966年10月4日的黨報《烏克蘭真理報》(Pravda Ukraini)提到蘇聯地下教會的一名領袖普羅科菲耶夫(Prokofiev)弟兄。他雖然已經下牢三次，但每次出獄，就繼續進行秘密主日學，於是再度被捕。他在秘密宣言裡寫道：“官方教會順服人的規條（共產黨的規條），就喪失了神的祝福。”

當你聽到一個弟兄下監獄時，不要以為那裡的監獄類似西方的監獄。在受限制的國家，監獄意味著饑餓、酷刑，和洗腦。

1966年第9期的《科學與宗教》(Nauka i Religia)報導說，基督徒傳播的福音刊物，封面是採用一種流行月刊《小火焰》(Ogoniok)（與美國的《展望》和《時代》週刊相似）做掩護。他們又贈送一些書，封面是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裡面卻是聖經的一部分。

這些基督徒也在公共場合唱基督教的歌：唱的調子是共產黨的《國際歌》(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但歌詞卻是讚美基督（見《哈薩克真理報》(Kazakstankaia Pravda)1966年6月30日）。

基督徒在一份從西伯利亞庫倫達(Kulunda)印行的秘密信件中，提及浸信會的官方領袖“摧毀教會與真信徒，就如大祭司與法利賽人把耶穌出賣給彼拉多”。但忠信的地下教會仍繼續工作！

基督的新婦繼續侍奉祂！共產黨自己也承認說，地下教會贏得了共產黨員歸向基督。共產黨員可以悔改得救！

1966年4月27日的《巴庫工人報》(Bakinskii Rabochi)轉載一名歸主的女共青團員塔尼婭·丘古諾娃(Tania Ciugunova)之信件。這信被共產黨官員沒收，其中寫道：

親愛的娜蒂婭(Nadia)阿姨，願主祝福你。娜蒂婭阿姨，主耶穌是何等的愛我！雖然我們在祂面前什麼也不是。我相信你明白這話的意思：“當愛你們的仇敵，詛咒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恨惡你們的要待他們好，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

當這封信被沒收後，帶領這少女和許多其他年輕的共產黨員信主的彼得·謝列布列尼科夫(Peter Serebrennikov)弟兄也被捕入獄。黨報引述彼得弟兄的一段講章：“我們必須相信救主，就如初期教會的基督徒一樣。對我們，聖經是主要的法律。我們不承認其他的法律。我們必須趕快救人脫離罪惡，尤其是年青人。”他明知蘇聯法律禁止向年輕人傳福音，但“我們唯一的法律是聖經”——這是在殘酷的無神論獨裁統治下最理所當然的回答。

然後這黨報就形容一個非常“野蠻”的畫面：“少年男女們唱屬靈的詩歌。他們接受洗禮，持守什麼愛仇敵的邪惡教導。”《巴庫工人報》(Bakinskii Rabochi)說及許多共青團員其實是基督徒！它的文章末了說：“共產黨學校多麼無能、無聊、缺少亮光。以至牧師們能夠在我們冷漠的教育工作者面前爭奪他們的學生。”

1966年6月30日的《哈薩克真理報》(Kazakstanskaia Pravda)表達了他們的恐慌：他們發現成績最好的學生竟然是一名基督徒男孩！

《吉爾吉斯真理報》(Kirgizskaia Pravda)在1966年1月17日提及一份地下教會寫給母親們的小冊子：“讓我們同心協力的禱告，當孩子們還在襁褓中時，就把他們獻給神。我們必須救他們脫離世界的影響。”

這些努力非常成功。共產黨的報紙證實了基督教在青少年中蓬勃發展！

蘇聯一份來自車裡雅賓斯克(Celiabinsk)的報紙也形容一位女共青團員妮娜(Nina)如何因參加一個秘密的基督徒聚會而成為基督徒。

1966年第9期的《蘇維埃司法報》(Sovietskaia Justitia)說及這樣的一個地下聚會：“聚會在半夜舉行。人們從各地前來。他們隱藏自己，小心翼翼，甚至對自己的影子也保持警惕。弟兄們在一間低矮又黑暗的房子裡聚集。出席的人那麼多，連跪的地方也沒有。由於缺少空

氣，那盞老油燈也熄了。人們都滿頭大汗。在外面的街頭，一位神的僕人正在把風，防備警察的到來。”但妮娜卻說在這樣的聚會，人們以擁抱、溫暖和關懷接納她。“他們有一種偉大而啟發的信仰（我現在也一樣）——對神的信仰。神把我們置於祂的保護之下。讓那些認識我的共青團員不睬我也罷！讓他們藐視我，稱呼我（就像用巴掌打我的臉）‘浸信會’也罷！我不需要他們。”

許多其他的少年共產黨員也像妮娜，決定服侍基督到底。

1967年8月18日的《哈薩克真理報》(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對克拉森(Klassen)、邦達爾(Bondar)、和泰勒欣(Teleghin)弟兄的審判。我們不曉得他們獲得什麼處罰，只知道官方公佈他們的罪行是：向孩童傳福音。

1967年6月15日的《蘇聯吉爾吉斯亞報》(Sovietskaia Kirghizia)抱怨說，“基督徒故意挑撥當局給他們施加行政措施。於是，無辜的共產黨當局不斷地被這些不滿足于自由的頑固基督徒所激怒，再次逮捕了另一批人。”他們的罪行是擁有一架非法印刷機，十五台蠟紙印刷機，並六台裝訂機，用於印刷基督教文獻。

1968年2月21日的《真理報》(Pravda)提及數以千計的婦女和少女在她們頭上紮的緞帶和腰間圍的腰帶上都印有聖經經節和禱告文。當局發現那個發動這新潮流（這新潮流我也推薦給西方）的人，竟是一個共產黨的警察，一個名叫斯塔修克(Stasiuk)的基督徒。這報紙稱這名基督徒被捕了。

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在共黨法庭上的回答，是被天上啟示的。一名法官問：“你們為什麼吸引眾人信你們的非法信仰？”一位基督徒姐妹就回答說：“我們的宗旨是為基督贏得全世界。”

在另一場審訊中，法官說：“你們的宗教是反科學的。”那位受審問的女學生就回答道：“你比愛因斯坦和牛頓更懂科學嗎？他們都是信神的人。我們的宇宙有愛因斯坦的名字——我的中學課本稱之為愛因斯坦宇宙。愛因斯坦寫道：‘如果我們將先知的猶太教和耶穌所傳授的基督教，從後來添加的內容中，特別是從神職操縱的教權統治中加以淨化，我們就會得到一種能夠拯救世界免於一切社會罪惡的宗教。每個人都有神聖的責任盡其所能使這個宗教獲勝。’還記得我們偉大的物理學

家巴甫洛夫(Pavlov)！黨方的書不也說他是一個基督徒嗎？連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前言也說：‘基督教，尤其是它的新教教派，是重建一個被罪摧毀的生命的最理想的宗教。’我的性格已經被罪破壞了。馬克思教我作一個基督徒以重建生命。你這個馬克思的門徒，怎麼為這個審問我？”

那位法官啞口無言。

對於基督教是反科學的這個指控，一位基督徒在庭上的回答是：

“法官大人，我肯定你不像發明氯仿(chloroform，一種麻醉藥)和其他藥物的詹姆斯·楊·辛普森爵士(Sir James Young Simpson)那麼精於科學。有人問他，他最偉大的發現是什麼；他回答道：‘我最偉大的發現不是氯仿。而是發現自己是個罪人，可以被神的恩典所拯救。’”

生命、自我犧牲、隨時準備為信仰而灑鮮血——這就是地下教會所代表的基督教最有力的論證。這是非洲著名的宣教士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所稱的‘神聖的疼痛團契’，就是憂傷之子耶穌所屬的團契。地下教會憑著愛與救主聯結，也與教會的各肢體聯結。這世界沒有人能擊敗他們。

在一封秘密帶出來的信件裡，地下教會寫道：“我們不求成為更好的基督徒，只求成為神希望我們成為的那種基督徒——有基督模樣的基督徒，樂於背負榮耀之十字架的基督徒。”

這些基督徒在被法庭審訊時，總是拒絕洩露誰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就如耶穌所教導的，靈巧像蛇。

《東方真理報》(Pravda Vostoka)在1966年1月15日報導說，當官方問瑪麗亞·謝夫丘克(Maria Sevciuk)，是誰帶領她歸向基督時，她回答道：“神引導我到祂的會所。”另一名被告被問到“誰是你的領導？”時，他回答說：“我們沒有人類的領袖。”

共產黨問基督徒的孩童：“誰教導你脫掉紅領巾，離開少先隊？”他們回答道：“我們自願如此。沒有人教我們。”

雖然在一些地方，這冰山的一角公然顯露，但在另一些地方，就比較隱藏。有些基督徒自我施洗，免得他們的領袖被捕。還有一些地方，信徒在河邊施洗時，施洗者和受洗者都戴著口罩，免得被人拍照認出。

1964年1月30日的《教師報》(Uchitelskaia Gazeta)提及在沃爾內奇諾-科爾斯基(Volnecino-Korskii)區的沃羅寧(Voronin)村的一場無神講座。當講員講完後，“信徒們馬上提問，公開攻擊無神論的教導。他們問：‘你們共產黨員從哪裡得到道德宗旨，就是你們只說不守的——諸如不可偷盜，不可殺人’？講員不能回答”。這些基督徒就向講員顯示這些宗旨都來自共產黨所反對的聖經。那位講員完全被弄糊塗了。那場講座的結果是信徒得勝！

對地下教會的迫害日益加劇

今日在前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些地區的基督徒仍然受逼迫。在世界範圍內的受限制國家中，地下教會的基督徒比以前遭受更多的壓迫。據估計，僅1997年，就有大約16萬基督徒殉道。基督徒聽到猶太人在共產國家受逼迫，就感到心碎。但蘇聯與諸共產國主要的逼迫對象卻是地下教會。多年前，蘇聯報章提及新的一輪大逮捕。在一個地方，八十二名基督徒被關進一所瘋人院。其中二十四人在數日後死亡，原因是“長時間的祈禱！”誰曾聽說長時間的祈禱會致人於死地？你可以想像他們經過何等的折磨嗎？

他們最大的痛苦是，如果官方發現他們教導自己的孩子認識基督，就把他們的孩子奪去，使他們永遠不得再相見，連探望孩子的權利都沒有。

在共產黨執政期間，蘇聯也在聯合國簽約，“反對教育方面的歧視”。條約說明：“父母有權按自己的信念，給自己的孩子們宗教與道德的教育”。在一篇文章中，蘇聯官方浸信聯會的領袖，叛徒卡列夫(Karev)，保證這就是蘇聯的現狀。只有傻瓜才信他！請看蘇聯報章的報導：

1963年6月4日的《蘇維埃俄羅斯報》(Sowjetskaia Russia)提及浸信會員馬加林可娃(Makrinkowa)的六個孩子被當局奪去，因為她教導孩子們基督教信仰，禁止他們佩帶少先隊的紅領巾。

當她聽到判決時，她只說了一句“我為信仰受苦”。這些孩子們被帶走，去接受無神論的毒害，她還必須支付他們的寄宿費用。基督徒母親們啊，想想她的痛苦吧！

《教師報》(Uchitelskaia Gazeta)提及同樣的事也臨到伊格納季·穆林(Ignatii Mullin)和他的太太。法官要求他們放棄信仰。“你們要神，還是要自己的女兒？”那位父親回答道：“我決不放棄我的信仰。”

保羅說：“萬事都互相效力”(羅馬書 8 章 28 節)。我見過這樣的基督徒孩子，在被政府奪去之後，卻在共產黨的學校裡傳播他們在家裡學到的信仰！他們不但沒有中無神論的毒，反而把福音帶給其他孩童！

耶穌說，愛自己孩子過於愛祂的，就不配作祂的門徒。(參馬太福音 10 章 37 節)這話對鐵幕國家的基督徒意義深遠。

嘗試一個星期不與你的孩子們相見！你就可以體會到在受限制國家的弟兄姐妹們所受的苦。據 1967 年 3 月 29 日蘇聯官方報章《青年旗幟》(Znamialunosti)報導，西特斯(Sitsh)太太因為教導兒子弗謝季斯拉夫(Vsetsheslav)敬畏神，這孩子就被奪去。紮巴瑋娜太太(Zabavina)因為給父母雙亡的孫女塔尼婭(Tania)“不正常”的基督教教育，就喪失這孫女的撫養權(見《蘇維埃俄羅斯報》Sovietskaia Rossia, 1968 年 1 月 13 日)。在受限制的國家，這些基督徒父母的撫養權如今依然被剝奪。

我們不能單單提及新教的地下教會。

蘇聯的東正教基督徒也完全改變了。他們有數百萬人下牢。牢中沒有念珠、沒有耶穌殉難的十架、沒有聖像、沒有壇香、也沒有蠟燭。平信徒在牢中也沒有神父。神父們也沒有聖袍、沒有麵包、沒有聖禮的酒、沒有聖油、也沒有印成的祈禱文。但他們發現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反而可以憑著禱告直接到神那裡去。他們就開始禱告，神也開始把祂的聖靈傾倒在他們身上。於是，一個真實的靈命復興（就如初期教會），就發生在共產統治下的蘇聯東正教。

於是在蘇聯與東歐諸國，出現一種東正教的地下教會。這教會實質上已是基要福音派教會，非常接近神。他們只在習俗上仍保留一點東正教的儀式。這教會有極多殉道者。誰曉得卡盧加(Kaluga)年邁的大主教

葉爾摩根(Yermogen)如今在哪裡？他敢於抗議教會的元老與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政府之間的背信棄義的合作，於是就忽然失蹤了。

1990 年代蘇聯共產黨倒臺，在蘇共長達七十年的統治時期，蘇聯報章卻充滿了地下教會勝利的報導！地下教會經受了不可言喻的大苦難，可是依然忠心，而且繼續成長！

我們在羅馬尼亞向蘇聯駐軍秘密撒種。其他人也在蘇聯本國，或在蘇軍進駐的其他國家進行撒種。這些福音的種子已經結果累累。

我們可以為基督贏得共產亞洲和其他被共產黨壓迫的國家。我們的敵人可以變成基督徒！受這些敵人壓迫的人也可以變成基督徒，只要我們幫助他們。

當今地下教會在共產主義蘇聯、在共產主義亞洲、以及在中東的蓬勃發展，就是很好的證明。

以下是幾封來自蘇聯女孩的信件，讓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基督徒同胞的美麗（哪怕在可怕的光景下）。最後的兩封信寫自蘇聯監獄。

共產少女瓦利婭(Varia)如何找到基督

這三封信是一位基督徒少女瑪利亞寫的。帶領共青團員瓦利婭信主的便是她。

第一封

…我繼續生活在這囚牢裡。我大蒙疼愛。牢中一位女共青團員也疼愛我。她對我說：“我不能瞭解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在這裡，那麼多人侮辱你、傷害你，你卻依然愛他們所有人。”我回答說，神教導我們要愛所有的人，不只是朋友，也包括敵人。過去這位少女給我很大的傷害。但我特別為她禱告。當她問我可以不可以也愛她時，我就擁抱她。我們倆都痛哭。如今我們一同禱告。

請為她禱告。她名叫瓦利婭。

當你聽到有人大聲反對神，好像他們真是這樣時，其實他們只是外表如此。後來你會發現，許多嘴上咒罵神的，心中卻大大渴望

神。你仿佛聽到他們的心在呻吟…這些人其實正在尋找一些事物，試圖用他們的無神論填滿內心的空虛。

你們在基督裡的姐妹，瑪利亞上。

第二封

我上一封信，提及不信神的少女瓦利婭。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現在我趕緊告訴你們大喜的消息：瓦利婭已經接受基督為個人救主，而且公開向每個人做見證。

當她信耶穌，曉得救恩的喜樂時，她同時也非常不開心。因為過去她曾經宣揚沒有神。如今她決定儘量彌補以往的過失。

我們與瓦利婭一同參加無神的聚會。雖然我警告她必須緘默，可是沒用。瓦利婭出席，我也同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在眾人唱完黨歌（瓦利婭沒有唱）之後，瓦利婭就上臺在眾人面前大膽見證基督為救主，又請求前同志們的饒恕，因為過去她盲目，不曉得自己正在滅亡的路上，還誤導眾人。她懇求眾人放棄罪惡，歸向基督。

所有的人都肅靜，沒有一人打擾。她講完了，就以嘹亮的歌聲，唱出整首基督教聖歌：“我不以宣揚基督為恥。祂為捍衛祂的誠命和十字架的大能而死。”

過後…過後他們就把我們的瓦利婭帶走了。

今天是五月九日。我們依然沒有她的任何消息。但全能的神會拯救她。讓我們禱告！

你們的瑪利亞上。

第三封

昨天是八月二日。我得與我們親愛的瓦利婭在監獄中談話。我想到她就心裡流血。她還只是一個孩子，才十九歲。按她的信主年日，她也是一個初生的嬰孩。可是她卻全心愛主，馬上行走那艱難

的道路。這女孩那麼饑餓。當我們得知她入獄後，就開始寄送包裹給她。可是她只收到寄給她的一小部分。

昨天我看到她，蒼白消瘦，又有被打的痕跡。只有她的眼睛發出來自神的平安，還有一種不屬於地上的喜樂。

親愛的同胞們，真的，這奇妙的平安不是一個未曾經驗的人所能理解的。那些擁有這平安的人是多麼快樂…對我們在基督裡的人，沒有任何苦難或挫折能阻止我們…

我在鐵窗外邊問她說：“瓦利婭，你後悔自己所作的嗎？”她回答道：“不，如果他們釋放我，我就會再告訴他們有關基督的大愛。不要以為我正在受苦。我非常高興，因為主那麼愛我，並在我為祂的名受難處時賜給我喜樂。”

請特別為她禱告。當局可能把她送往西伯利亞。他們拿走了她的衣服和所有其他的物品。目前她除了身上穿著的，什麼也沒有了。她也沒有親屬。我們必須為她收集最需要的日用品。你們寄給我的最後一次款項，我已分別出來。如果瓦利婭被遣送，我就把這些錢交給她。我相信神將會堅固她，給她力量承受將來。願神保守她！

你們的瑪利亞上。

第四封

親愛的瑪利亞，我終於有機會寫信給你。我們已抵達（地名略去）。我們的營地離開市區十英里。我不能描述我們的生活，這是你知道的。我只想寫一點關於我自己的事。我感謝神，給我健康，叫我有體力可以做工。我和甲姐妹一同在車間操作機器。工作很難，甲姐妹的健康很差，我必須做我們兩人的工作：我先完成我的份，然後就協助她。我們每天工作十二或十三小時。我們的食物和你們一樣非常少。但這不是我想說的。

我心中讚美感謝神。祂借著你帶我走上救恩之路。如今在這路上，我生命開始有目的，知道往哪裡去，又知道為誰受苦。我感到必須告訴每個人，向每個人見證在我心中救恩的大喜樂。誰能把我

們與神的愛分離？什麼都不能。監牢與痛苦也不能。神給我們的苦難只會堅固我們對祂的信心。我的心那麼充實，以至神的恩典湧流。工作時，他們詛咒我，處罰我，給我額外的工，因為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必須告訴眾人神為我做了何等的大事。耶穌已經把我造成新人。我這個已經在滅亡之路上的人，得到這麼大的救恩，可以沉默嗎？不，永遠不能！只要我的舌頭還能說話，我就要向每個人見證祂的大愛。

在去營地的途中，我們遇到了許多主內的弟兄姐妹。這真是奇妙：你初次見到他們，在靈裡就曉得他們是神的兒女。完全不用言語。你第一眼見到他們，就曉得他們是誰。

我們前往營地的途中，在一個火車站上，一位婦人過來給我們食物，又說：“神活著。”

我們抵達的第一個傍晚（那時天色已暗），他們帶我們到地下囚室。我們向裡面的犯人們問安說：“願你們平安。”令我們非常高興的是，從每一個角落都有人聲響應道：“我們平安地接納你們。”從那晚開始，我們就感到如同在一個大家庭裡。

果真是如此。這裡那麼多人相信基督為個人的救主。超過一半的囚犯是基督徒。我們中間有好歌手，又有好講員。黃昏時，在繁重的勞動了一整天後，我們就聚集在救主腳前，一起禱告。這是多麼美好的聚會。有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有自由。我在這裡學到許多美麗的聖詩。神每天都加添給我祂的話語。十九歲時，我才第一次慶祝基督的誕生。我怎能忘記這奇妙的日子！那一天我不得不幹了一整天的活，但有一些弟兄們找到機會到附近的河邊破冰，做準備工作。夜間，我和七名弟兄就遵照神的話受了浸禮。我是多麼快樂，我多麼希望你，瑪利亞，也能同在，好叫我可以為過去開罪你的地方懺悔。但神叫我們各人站在祂給的地方，我們必須在各自的領域站住。

請向神的全家問安。神必豐豐富富地賜福給你們，就如祂賜福於我一般。請讀希伯來書 12 章 1-3 節。

我們所有的弟兄們都向你問安，他們因為你對神如此堅定的信心，並你在苦難中仍不斷讚美祂而感到欣慰。如果你寫信給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代我們問候他們。

你的瓦利婭上

第五封

親愛的瑪利亞，我終於得到機會寫幾句話給你。我可以告訴你，我親愛的，靠著神的恩典，我和甲姐妹依然健康，感覺良好。我們如今正在（地名略去）。

我感謝你像母親一樣照顧我。我們收到了你為我們預備的一切。我感謝你給的最寶貴禮物，就是聖經。代我向每個人道謝。在你寫信給他們時，代我問候他們，感謝他們為我做的這一切。

自從主向我顯示祂的神聖之愛後，我就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快樂的人。我受逼迫也是特殊恩典。我感謝主，在我信主的第一日開始，就給我為祂受苦的大喜樂。請替我禱告，叫我可以忠心到底。

願主保守你們，堅固你們繼續這場聖戰！

我和甲姐妹向你們親嘴問安。當我們抵達（地名略去）之後，或者我們有機會可以再寫信給你們。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高興歡喜，因為我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馬太 5 章 11-12 節）。

你們的瓦利婭上

這是瓦利婭的最後的一封信——這位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找到了基督，為祂作見證，後被判勞改。此後再無人聽到她的消息，但她對基督的愛和見證，展現了受苦的、忠心的地下教會的屬靈榮美。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人們稱我為“地下教會之聲”。地下教會是基督身體那麼尊貴的一部分，我以為自己不配。

但在共產國家，我的確帶領這地下教會的其中一部分許多年。我在十四年監禁（包括兩年之久的“死亡室”）與酷刑後，依然存活，便是神跡。神又行更大的神跡，利用合適的時機，將我從監獄帶出。羅馬尼亞的地下教會決定，我應該離開我的國家，把消息帶給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奇跡般地，我和家人得以離開，我得以完成託付給我的使命，就是如今仍然在一些被奴役國家勞作、冒險、受苦、犧牲的弟兄們所託付我的。

我代表那些正躺在無數無名墳墓裡的眾弟兄說話。我也為那些如今正在森林中、地下室、閣樓和其他場所秘密聚會的弟兄們說話。

地下教會的信息就是：

“不要離棄我們！”

“不要忘記我們！”

“不要放棄我們！”

“給我們所需用的工具，我們樂意付出使用的代價！”

這就是我所領受的命令。

我為地下教會——那沉默的、“啞巴的”、無法向外界發聲的教會——說話。

請聽被壓迫國家弟兄姐妹們的呼聲！他們並不要求獲得逃脫，或掛慮個人安危，或想要安逸的生活。他們只求工具，得以對抗無神論對他們的年輕人——他們的下一代——的毒害。他們需要聖經，來傳達神的話。沒有聖經，他們如何傳道？

地下教會就如一個乘坐火車外出旅行的外科醫生。忽然這火車與另一輛火車相撞，導致上百號人躺在地上，肢體錯位、受傷、垂死掙紮。這外科醫生行走在垂死的人們中間，急得喊叫：“如果我有手術工具！如果我有手術工具！”這醫生有心無力。若有手術器械，他就可以救很多人。他有心救人，卻沒有工具。地下教會正是這樣。她何嘗樂意付出

一切，她何等樂意作殉道者，她何等樂意冒險坐牢數年！但沒有可用的工具來發揮作用，這一切意願都毫無價值。這些勇敢忠心的地下教會對自由世界的基督徒的請求是：“給我工具——福音書、聖經、基督教讀物、並資助經費——至於其他的事，由我們來做！”

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每個自由的信徒都可以透過下述管道，立刻援助。

無神論者不承認生命有一個不可見的源頭。他們對宇宙與生命的奧秘，一無所知。基督徒通過不憑眼見，而憑信心行事，過一種與看不見的神相交的生活，就可以感化身邊不信神的人。

西方基督徒如果活出一個獻身、真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能最好地協助我們。每逢有基督徒在鐵幕後受逼迫時，如果西方基督徒馬上公開抗議，就能幫助我們。

西方基督徒還可以為那些逼迫我們的人的靈魂得救禱告，雖然這樣的禱告看起來很幼稚：今天我們為共產黨禱告，明天他們就給我們更厲害的酷刑。但主耶穌為耶路撒冷的禱告也很“幼稚”：祂禱告後，他們就給祂十字架。可是不過數日之後，這些人就捶胸懊悔，一日之間五千人悔改。（參使徒行傳 4 章 4 節）

我們為其他人的禱告，也不是徒然的。凡不領受你禱告的，這禱告就帶著更大的祝福歸回你。我和許多基督徒過去常為希特勒並他的同黨禱告。我可以肯定我們的禱告就如聯軍的子彈一樣有效地打敗了他。

我們必須愛鄰舍如同自己。共產黨員和其他施刑者也是我們的鄰舍之一。

他們的出現是因為基督徒沒有奉行基督的吩咐：“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基督徒沒有叫每個人的生命豐盛。他們讓一些人被排斥在一切有價值的生活的邊緣，於是這些人就反叛，組成共產黨或其他假宗教。他們常是社會不公的受害者，以致於心中苦毒又殘忍。我們必須與他們相爭。但一個基督徒就是在與敵相爭時，依然可以瞭解對方，愛對方。

對於有些人生活在叛逆中這一事實，我們並非無辜，至少是我們的失責。

為這個緣故，我們必須愛他們（這完全不同於喜歡他們），為他們禱告，這算是彌補我們的過失。

我沒有那麼幼稚，以為單憑愛，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我也不會勸告任何一個政府，單用愛去解決黑幫的問題。一個政府對待黑幫，必須靠警察、法官和監牢，不能單靠牧師。如果黑幫不肯悔改，就必須坐牢。對抗共產黨和其他獨裁者，決不能只用基督徒的愛，更需要用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力量予以制裁。共產黨就像是巨大的國際幫派：街頭的黑幫只會盜取你的錢包，他們卻盜取整個國家。

但牧師與平信徒也必須帶領這些叛逆的人（不管他們犯了什麼罪），以及受他們逼迫的無辜的受害者，歸向基督。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為他們祈禱。

我們極需聖經

其次是，提供整本聖經或分卷聖經。只要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們願意提供這些書籍給地下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就有辦法可以輸送到鐵幕國家的弟兄姐妹手裡。當我還在羅馬尼亞時，已經收到許多來自國外的聖經。輸送和分發不是問題，只要有人願意提供聖經。

他們極需聖經。共產國家如中國和北朝鮮，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已經幾十年未見過聖經或福音書了。

當我還在羅馬尼亞當牧師時，一天，有兩位全身汙穢的村夫來到我家買聖經。他們來自鄉下，整個冬天為人剷除凍土，只希望賺取足夠的錢，或許可以買到一本老舊的聖經帶回家鄉。因我常收到來自美國的聖經，就給他們一本全新的聖經。他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要把做工賺來的錢給我。我沒有收。於是他們帶著聖經趕回家鄉。幾天之後我收到一封充滿歡樂的感謝信，有多達三十名村民簽名。他們已經仔細地把聖經分切成三十份，以便彼此交換閱讀！

聽到一個蘇聯人乞求一頁（不是一本）聖經來餵養他的靈魂，令人感到悲哀。他們不惜用一頭牛或一頭羊去換取一本聖經。有一個人就用

他的結婚戒指換取一本殘破的新約全書。很多孩子們從未看過一張聖誕卡片。如果他們得到一張，全村的孩子們都會聚集，或許就有一個老年人會向他們解釋嬰孩耶穌、祂的由童貞女所生、以及基督與救恩的故事。這都源自一張聖誕卡！我們可以寄送聖經，福音書和其他基督徒讀物到受限制的國家。這是你可以做的事。

我們也印刷和發送特別的書籍，對抗無神論的茶毒。從幼稚園到大學，他們在學校被灌輸無神論。在蘇聯，共產黨已經印刷了《無神論手冊》一書，作為無神論者的《聖經》。幼稚園的孩子們讀這書的簡易本。青少年的是更深入的版本。這本邪惡的《無神論手冊》和它的無神論毒素就陪伴我們的孩童一起成長。我們為此印刷並分發了《答無神論者手冊》，作為基督徒對有毒的無神論教義的回答。

我們中了毒的青少年必須有個答案——神的答案——基督徒的答案——我們的答案！這是你們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提供特別的讀物（如連環畫和兒童聖經）給這些國家（在這些國家，神是“非法的”）。

我們也必須與地下教會的弟兄姐妹手把手，在經濟上支持他們，讓他們有交通費到各處進行個人佈道。如今他們因為缺少交通費和食宿費，就被“困鎖”在家。附近二、三十裡外的鄉村呼喚他們去參加秘密聚會時，他們都無法成行。如果我們每個月提供他們資金，就可以打開“鎖鏈”，把神的話傳到偏遠的鄉村。例如，我們可以購買摩托車給中國和越南的牧師們到他們國家的“禁區”傳福音。也可以提供自行車給孟加拉的基督徒，他們一直冒著巨大的風險向穆斯林作見證。

我們必須在經濟上幫助平信徒。因為基督徒的收入僅夠勉強維生，使他們無法到各個鄉村去傳福音。每月給他們數美元便可以創造“奇跡”。

官方教會的牧師們，有些也冒著極大的危險進行秘密聚會。他們無視官方規定，願意冒險服侍青少年、孩童、和成年人。他們也需要資金拓展這些富有成效的秘密事工。在經濟上幫助他們，就是協助地下教會的成員有效地傳福音。

另外，我們必須借著廣播電臺，向被奴役國家傳播福音。我們可以利用自由世界的廣播站，餵養靈裡饑渴的地下教會。他們極其需要生命的糧。因為共產黨政府正在使用短波頻道，向自己的公民宣傳無神論，

所以在這些國家有數百萬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廣播。福音廣播的門是敞開的，這項工作必須拓展。地下教會必須得到這些電臺提供的靈糧。這是另一個可以幫助地下教會的途徑。

基督徒殉道者家屬的悲慘遭遇

我們也必須給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提供幫助。數以萬計的殉道者家庭面臨極大的艱難。當一個地下教會信徒被捕時，他的家庭就大受打擊，因為幫助這些家庭是非法的。這是當權者精心策劃的，為要加深殉道者妻兒的痛苦。一個基督徒下牢的日子——通常這意味著酷刑或死亡——苦難方才開始。他的家庭開始受無盡的痛苦。我可以告訴你們，如果西方基督徒沒有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家庭，我們根本無法活到今天，更不可能寫下這些文字！

殉道者的數目每時都在增加。儘管他們走向墳墓並獲得天上永遠的獎賞，他們的家人卻活在極其悲慘的環境中。我們能夠也必須幫助他們。當然，我們也應該支助饑餓的印度人和非洲人。但最該得到基督徒協助的，不就是那些在極權國家為基督而死，或在獄中為主受苦的基督徒的家庭嗎？

自從我出獄後，殉道者之聲這個組織已經寄送許多援助給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但這還只是杯水車薪，遠遠不足。

地下教會委託我帶給你們的信息

作為一個倖存下來並逃脫出來的地下教會成員，我帶給你們一個信息，一個呼籲，一個鐵幕背後的弟兄姐妹們的懇求。

他們派我來把這個信息傳達給你們。我奇跡般地活下來，就是要傳遞這信息。

我已經告訴你們共產世界和其他被壓迫國家急需得到福音。我又告訴你們，那兒的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急切需要援助。我也告訴你們，可以如何提供有效的幫助，協助地下教會完成傳福音的使命。

當我的腳底被棍擊打時，我的舌頭（口）會發出哭叫的聲音。為什麼舌頭會哭叫？它並沒有被打呀。它哭叫是因為它與腳同屬一個身體。你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與現在正在極權國家監獄裡被毆打甚至為主殉道的基督徒，也同屬一個身體——基督的身體。你們不能感受到我們的疼痛嗎？

初期教會的一切榮美、犧牲和奉獻，如今在這些國家再次活活展現在我們眼前。

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中痛苦禱告時，彼得、雅各和約翰就在一石之遙的地方，但他們卻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悲劇發生之時沉沉地睡著了。你對基督徒的關心和奉獻有多少是用於救濟殉道的教會？請問問你的牧師和教會領袖，他們以你的名義為世界各地極權國家的弟兄姐妹們做了什麼？

如今在這些國家，信徒就如初期教會的門徒一樣英勇、殉道——而自由國家的教會卻在沉睡。

我們在那裡的弟兄姐妹，孤獨無助，正在進行二十一世紀最偉大、最勇敢的戰鬥，他們展現的英雄主義、勇氣和奉獻精神，堪比初期教會。而自由世界的教會卻在繼續沉睡，對他們的掙紮和痛苦熟視無睹，就像彼得、雅各和約翰在救主痛苦時沉睡一樣。

當你的主內弟兄姐妹為福音受苦和爭戰時，你也會沉睡嗎？

你會聽到我們以下的呼聲嗎？“紀念我們，幫助我們！”“不要拋棄我們！”

現在，我已經傳達了來自忠誠的殉道教會的信息——來自那些在無神論共產主義枷鎖下受苦的你的弟兄姐妹們的信息，他們正在世界各地遭受攻擊，從印尼到非洲。不要拋棄他們。

.....